



中评周刊 | 第 96 期目录

专题 | 茅老 90：仁而寿，知无涯

1. 茅于軾 90 岁自述：我的喜悦与期待 P. 2
2. 盛洪：经济学家长寿 | 在庆祝茅于軾老师 90 寿辰午宴上的讲话 P. 11
3. 毛寿龙：自由的人生是有秩序的人生 P. 14
4. 笑蜀：推动市场向善 | 茅于軾先生最大的功德 P. 16
5. 茅于軾：我的经济学是我自己发现的 P. 21

观点文章

1. 2018《中评周刊》十大推荐文章 P. 26
2. 盛洪：如何扭转经济颓势？ P. 35
3. 郑也夫：教育是镶嵌在社会结构当中的 P. 42

随笔散记

1. 许章润：我家书桌在天地间 P. 51
2. 龚刃韧：从一则旧闻看美国新闻出版自由的意义 P. 52
3. 金雁：东欧的“犬儒化”阶段 P. 57

预告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64

订阅 | 往期下载 P. 66

茅于軾 90 岁自述：我的喜悦与期待

[**茅于軾**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学会理事长。本文为首发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 FT 中文网]

编者按 今天是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軾先生 90 岁生日。我们编发他的自述文章，通过他的人生历程回顾中国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聆听他从经济学角度反思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之得失，以及他对中国下一步转型的期待与嘱托。



十年前我八十岁的时候，曾经把人生经历划分成“二十年旧社会、三十年阶级斗争、三十年改革开放”三个阶段。这样概括虽然粗糙一点，但还是符合实际的。现在十年又过去了。

我的 90 年历程：20+30+40

我是 1929 年出生。从 1929 到 1949 的 20 年里，基本上是个学习过程。1949 年政权更替，这对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对我个人来讲，我 50 年大学毕业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我父亲在工程界是个老人，他认识很多的工程界人士，我大学毕业要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但是我家里对我们的事，特别我父亲，除非我自己选择，他不做任何干预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应聘到东北去。那个时候东北来个招聘团，到上海招聘人，头一批人，招聘到了哈尔滨，我是第二批还是第三批，就到了齐齐哈尔铁路局，这是我毕业之后第一次就业。我们上海交大机械系一共去了六个同学。应该说那个时候铁路局的人事气氛还是很好的，我们去了就培养我们，每个人都有锻炼的机会，我就开了一年的火车。这一年，无论是

在知识方面和锻炼自己吃苦耐劳方面，我都有很大的收获。



茅于軾父辈：父亲茅以新（右）、大伯父茅以南（中）、二伯父茅以升（左）

后来我怎么会调到北京来呢？因为那个时候铁道部要组织编牵引计算规程，里头有很多力学的问题，就组织了各个铁路局的工程师，在编规程的中间，选拔了一些人充实进刚刚建设起来的铁道研究院，那个时候还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有几个人调到了铁道研究所，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的一个转机。

我在铁道研究院呢，没干几年就划为右派了。我这个右派是 58 年划的，其他的大部分右派是 57 年划的。说起来也很有趣，57 年过去了，我也没事，以为划右派的事情过去了。到了 58 年，忽然铁道部来了一个人叫柴沫，他说茅于軾就是右派，原来这个事还没结束。这不是因为我当时说了什么特别的话。当时铁道部研究院的书记叫岳志坚，他对我相当了解，他当时给我做了一个定性，说茅于軾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是个技术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定性还是很准确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根本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想法，我的许多主张其实跟改革开放以后的做法是类似的，比如说开放市场、保护产权等等。58 年柴沫宣布我去当右派，到文革的时候柴沫挨整自杀了。柴沫夫人就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

然后大的变化，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了，市场起了作用了。你当了右派啊，你什么都完了，因为国家就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不用你，你除非到马路上去摆个摊，修鞋，才能养活自己。等到市场改革以后呢，老板多的是，你这儿不喜欢我，我找别的老板去，这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机构，一直接触外国的文献，我的英语一直没有丢，一改革开放，82 年，我就有机会出国去，以后就不断地出国，整个改变了我的生活。86 年我到哈佛做访问学者，开拓我的视野，接触到了世界上一流的学者，而且我有机会参与到国际的学术交流中间。那一段时间我每年要出国好几趟，一直到后

来老了，就越来越减少了。

要说我家庭对我的影响，我的父系母系，都自由开放，都是留学生，对我有点影响，但我的家庭也说不上有多了不起。我们家里出了一个（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他是我的二伯父。我妈妈陈家那边，也都有不错的人才，我的舅舅是国民党时的中央大学工学院的院长。这可能就是所谓家庭的背景，我有点优势。但家庭影响只是一个方面，我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很不少，但他们和我又不同，自己观察社会、观察世界、研究人生，还是有不同的深度。



茅于軾赵燕玲夫妇（后排左五、左六），茅于軾父母（前排左四、左五），
茅于軾二叔父茅以升（前排左六），茅于軾胞妹茅于兰（后排左二）

我是 55 年结婚的，也是我生活中一个重大的转折。我太太年轻时很漂亮的，周围好多男人，但我从来不问她你跟谁怎么怎么，我从来不问，我对自己有信心的。我觉得对于一般家庭来讲，应该把婚姻看成一个终身的契约，你对这个婚姻有信心，不是老动摇，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我们的婚姻成功，不仅仅表现在我们两个人感情的牢靠，而且表现为我们的子女有很好的家教。家教不是学校学出来的，是家庭培养的。做父母的首先要以身作则，要做出一个榜样来，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这些说起来呢，是一篇很长的故事，但是它跟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故事有共同点。我在想的就是，中国人的命运往往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当政者的手里。当政者搞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大家就都跟着倒霉。这就说明环境跟发展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独立的思考的环境，到现

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然现在比那个时候有一点进步，声音多元化了，有了互联网了，这些改变在我这一生中间是最明显的表现出来。

我为何选择经济学？

我五十多岁的时候，从工程师变成一个经济学者。为什么会选择经济学呢？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创造的。我们过去在经济学上犯了很多错误，我们的劳动没创造出财富来，反而是浪费了财富，什么大炼钢铁啊、上山下乡啊，都是劳动吧，但它的结果不是创造财富，国家反而变穷了。所以就要研究财富是如何创造的，这个我想，不光是我，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富有嘛是吧？

大家知道现在的经济学充满了数学，我进入经济学不困难的原因，就是我喜欢数学。我写的一本书，《择优分配原理》，就是用数学来解释经济学，这是我的一本成名作。我在开火车的时候，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火车首先必须按点到达目的地，但在这个过程中，速度是快还是慢，先快后慢，还是先慢后快？途中有坡道，上坡下坡，用什么办法来开这个火车？如何准点到达，而且燃料是最省的？这个完全变了个数学问题。我的数学比较好，所以进入经济学没困难。



茅于軾赵燕玲夫妇（分别摄于 50 年代与近年）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你要有一个比较宽阔的眼界，对你生活的环境，对全世界的状况，你要有一个眼界。这一点，我是从铁道研究院转到社会科学院之后获得的，这次调动靠的是李慎之。李慎之

当时是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所长，后来当了社科院副院长。我一个朋友叫王国乡，把我介绍给李慎之，我跟他谈了几次，他很欣赏我，就把我调到了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我进去时也有点担心，因为我要研究的是中国的改革。李慎之说，你花一半时间研究美国问题，其他一半时间，你研究中国就可以。李慎之是很自由派的，只要你能出成果就行，他在美国所的时候搜罗了好多右派。他喜欢右派，因为一般右派都有点独立思想，与众不同一点，所以才会当右派。

我到美国所是 84 年。86 年，两年以后，我就有机会访问哈佛大学，那个是改变我一生的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哈佛，我只听过一门讲税收的课，因为那时候中国没有税收，中国是计划经济，老百姓不交税，企业也不交税，利润都上缴了，所以税这个问题对我是陌生的。其他的课，说老实话，我都能教，我用不着听。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我在这个全世界一流学者集中的地方，跟他们交流，进入到了这个圈子里头。所以 86 年以后，一直到九几年，我每年有很多出国的机会。如果我不进哈佛，是不会有这些机会的。而且我的视野越来越宽，不光是经济学，我对制度、伦理都感兴趣。我写了本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就是讲伦理学的。视野的拓宽，是我很重大的变化。

我为何坚定地批评计划经济，呼吁“保护富人”？

我对计划经济一直持很批评的态度。其实在国际经济学界里头，有好几个对计划经济有深刻批判的经济学家，首先就是哈耶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通向奴役之路》就是讲的计划经济。凯恩斯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通向奴役的路上铺满了玫瑰花。你觉得非常好的路，但走来走去，就被奴役了，就进了地狱了，就是指的计划经济。所以不光是我，有水平的经济学家都看准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行。

Communism 这个词，是日本人翻译的，把它翻成“共产”，其实这个词没有“共产”的意思，它是“公社”的意思。公社就是在一个小范围里边，大家有平等的发言权，有自由的发展机会。日本人把它翻成“共产”，这把中国人害苦了。中国接受共产主义，在农村就把地主的地给共产了，城市里头搞公私合营。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又往共产主义加了很多新东西，比如“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本来没有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理想。

共产这个想法，马克思提出之后，辉煌过一百年，大家都觉得这是人类的理想，但是实践的结果都很糟糕。所以现在共产的思潮已经退潮了。现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国家？成功的一个没有。其实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人类要选择什么制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福山所说的，宪政民主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我一直讲，人追求平等，是很有理由的，但是世界上很多悲剧，就是追求平等造成的，包括共产主义思想。人跟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这是自然规律，它是不可抗拒的。当然我们不喜欢不平等，我们可以给它一些限制，做一些调整，但是你不可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共产主义就试图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财产公有，就造成悲剧了，这个可以说是历史最重大的一个教训。全世界最近这一百年间，导致

重大人身损失的问题，都跟过分地追求平等有关。

因为不能追求过分的平等，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我 2012 年获得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我想也和我的这个观点有关。要保护富人啊，但是很多社会是不是这样想的，而是妒忌富人。打击富人的社会，就会变成穷人国，因为他变富你就打击他嘛，那怎么会有富人呢？富人招大家恨，这个跟马克思的说法有关系：富人是剥削者，所以他才富起来。过去认为劳动创造财富，富人不劳动，却赚了很多钱，那肯定是剥削来的。现在的看法不是这样。到底是什么创造了财富？是配置。人和物要用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财富就创造了。那么谁在配置呢？企业家。所以企业家赚钱是很对的，因为他把人和物用好了。

这个问题很多国家到现在还是没认识到，就把国家搞得很惨，最典型的的就是委内瑞拉。我很关心这个国家，它从反面证实了马克思说法的错误。这个国家曾经是很富的，石油储量超过沙特，现在变成最穷的，全世界最倒霉的一个国家，通货膨胀空前的高，社会犯罪空前的高，东西都买不着。它的错误就是打击富人。

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呢？就是经济学家会告诉你，打击富人是不可行的，我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如果反过来，都是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做事，那这个社会就糟糕了。



茅于軾 2012 年获得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授予的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

我怎么看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我是个经济学家，简单地讲，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 40 年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搞清楚了

财富究竟是怎么创造的。财富是配置创造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能创造出财富。那么怎么才能尽其用？要有自由，要有市场，要有产权。这几十年，其实就是这一条经验。现在中国人有人身自由，有选择的自由，有财产的保障，这不就是人权吗？所以我们在人权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就是因为人身没有自由，财产没有保障。我们把这个改了，财富就极大地创造了出来。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比其他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更成功。计划经济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你有票就可以买便宜的肉、便宜的粮食，到了市场经济里你就得放弃票，到市场去买。你舍不得放弃这个票怎么办？我们搞了个双轨制。你那票照样还可以用，旁边有个市场，你不够可以到市场上去买，这就是双轨制，这就彻底解决了从计划过渡到市场的困难。这个中国是很成功的。

我回顾中国经济，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经过两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 1978 年那个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这个命题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实践不能检验真理，但是这种说法在当时对解放思想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它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实践里头，不是生活在文件里头。毛泽东时代我们就生活在文件里，文件告诉我们中国人怎么幸福，资本主义国家怎么水深火热，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是文件。第二次解放思想是 92 年邓小平南巡，不要区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逮着老鼠就是好猫”，让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现在还需要第三次解放思想，解放什么？解放对公有制的迷信。

如果问我现在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我就认为公有制的问题没解决。经济学里头有一条一般均衡理论。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让价格自由浮动，东西缺了能涨价，多了能落价，最后使得所有的商品都均衡了，不缺也不多，靠价格调节，这个时候效率是最大的，财富创造出最多，叫做一般均衡理论。但是一般均衡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缺了会涨价，多了会落价呢？它的背后是私有产权。李克强总理也说过，资源配置要由市场做决定，但是他没有说更重要的一条，市场是私有制的。如果市场不是私有制，是不可能来影响配置的。发达国家的效率高，没什么浪费，因为它是私有制，财产得到保护，价格能对供需变化做出正确反应，公有制下，价格是无法做出正确反应的。

中国的大问题，都出在公有制上头。我们产能过剩、消费不足、房地产泡沫、靠投资拉动 GDP、收入分配扭曲，全跟公有制有关系。美国有 5000 家银行，全都是私人办的，政府一家都不办，但在中国，政府包揽了全部银行，老百姓不可以办银行。老百姓不能办银行，那每个家庭多多少少有点储蓄，用来干什么呢？在美国，老百姓的储蓄不仅可以办银行，还可以办通讯、办电力、办石油。我们这些产业都是国家的，国家垄断了所有的赚钱行业，老百姓的储蓄没有投资机会，只能去买房，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就是从这来的。如果老百姓现在可以开银行了，他们可能会把房子卖掉去办银行，因为赚钱多嘛，房价马上就下来了。现在北京的房价比纽约都贵了，都是扭曲的，根子就在公有制。

当然我们现在不完全是公有制，我们现在是混合制，既有公有也有私有。但是我们很多重要的东西，还是由计划分配的。土地、资金，这两个最重要的资源和资本，不完全是市场分配。回到我说的物

尽其用，物尽其用包括地尽其用。如果我是土地的主人，我这块地该干什么用，我会不断地琢磨，是修路？盖房子？还是做停车场？我会老关心这个事。现在土地是公有的，没人关心，所以中国土地问题非常大。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土地没有尽其用，钱也没有尽其用。谁能把钱尽其用？就是金融业。土地和金融，这两个领域如果破除政府垄断，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不解决公有制的问题，我们也很难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功能应该是管理市场不要出乱子，它应该是做裁判员的。如果政府自己办了企业了，也在市场里头赚钱，就相当于裁判员出来踢足球了。虽然国有企业号称是全民所有，但我们人民能做什么呢？我们不能把国有企业卖了，我们没有处置权，没有经营权，没有收益权。现在我们国企的利润上缴比例很低，到 2020 年才上缴 30%，本来是不上缴或上缴不到 10%。你说这国企我们要它干嘛？

有人说公有制经济让政府有财力“办大事”，政府有钱才能修高铁、修高速公路、修那么多飞机场。但“中国政府有钱”的反面，就是“中国老百姓没钱”，这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一般来说，现在的投资是为了将来的消费，但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所以到了将来还是没有消费，这就会变成投资的自我加强，这个恶性循环就造成中国的产能过剩。所以我觉得现阶段也没有必要再保持一定比例的公有制经济了。

我最大的喜悦和期待

我活到 90 岁，最大的喜悦，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的背后是私有产权。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在市场化改革以前，所有的企业、商店都是公有的，都是国家的，没有私人的。你除非马路上摆个摊，修鞋，这是你私有的，或者你当保姆，你是自由的，其他所有的就业，都是这一个老板。后来改革到市场化以后呢，有了私有经济，又彻底地改变了经济的结构，我的命运也就随之而变。

你问我如果有选择，会不会想生逢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当然，如果我有选择，我希望到美国去。但是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想的不是我个人，是所有的人。那大家都到美国去？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可能的是，把我们的国家改变得比较像美国，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你可以为之努力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有个共识，你的目标是什么？我想现在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因为中国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美国去，或者到英国德国去，说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我记得 1989 年，我去东德，东德那时候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是算是经济最好的。我坐的飞机是到东德的，但是我开会的地方在西德，要从东德穿过去。刚去的时候柏林墙还没倒，我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车的德国人，他们都是有各种原因，经过特批，可以去到西德那边的。车子开过边界，车上所有的德国人都在欢呼。我当时觉得好奇怪，后来明白了，他们奔向了自由，这就可见人心所向。

当然出国学习生活，底层群众可能还够不着。等到底层群众也认识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我们改变的方向，那中国改变的可能性就更大。



2002 年,茅于軾创立富平职业学校,帮助培训家政服务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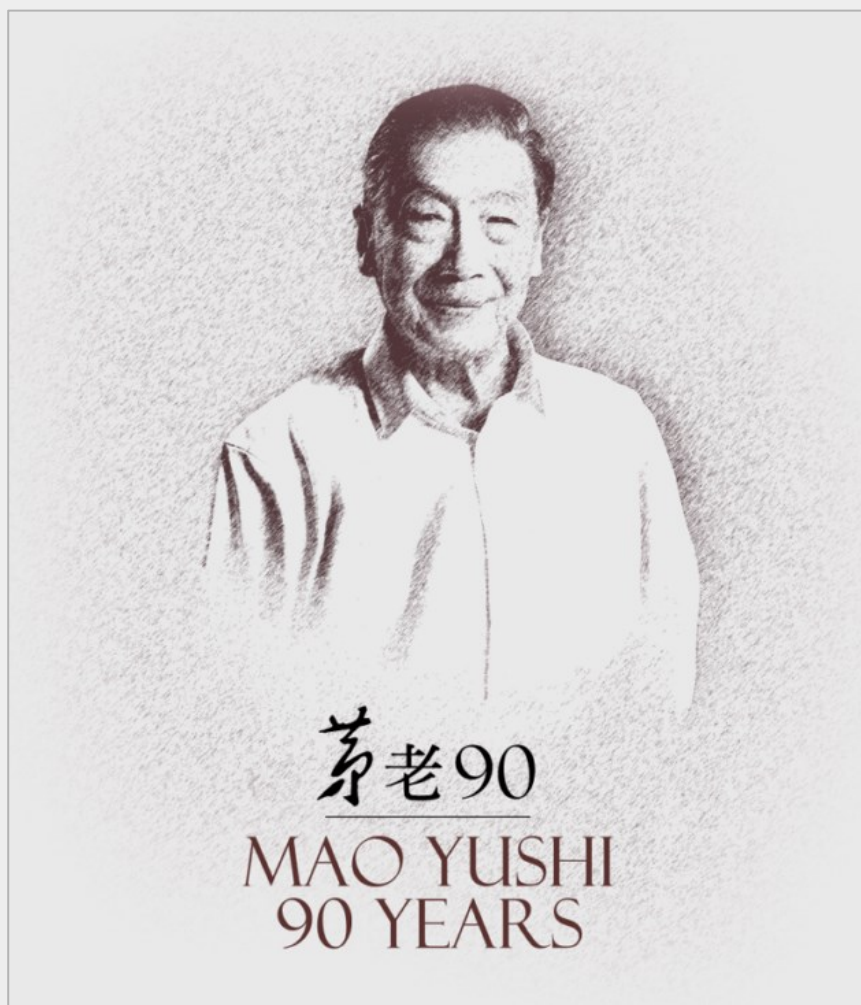
我最大的缺憾,很简单,就是中国还是一个专政社会,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地变成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国家。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可能我看不见,但也不会太远了。我在这方面是特别关心的,因为我懂得,倒退会带来灾难,所以我有个责任,防止社会倒退,推进社会进步。可以说我一辈子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防止倒退,促进进步。作为一个中国人,再也没有比这个目标更重要的事情。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我对他们的嘱托就是,我希望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非常希望他们追求真。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要追求?还要追求理,就是要有逻辑。这两点能做到,我们下一代就有希望了。 ❷

[【返回目录】](#)

盛洪：经济学家长寿 | 在庆祝茅于軾老师 90 寿辰午宴上的讲话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记得德姆塞兹教授（向他致哀）曾经说过，经济学家欢呼自己的英雄。茅于軾老师就是我们的英雄。我们不是时时都要向他欢呼。但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可以向他欢呼。再过两天，1月14日，就是茅老师的90岁寿辰。在这个日子里，我们要向茅老师致敬。

为什么要向茅老师致敬？是因为茅老师的贡献和他的道德文章。第一个贡献是，他独立发现了资源最佳配置的经济学原理。这就是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有人会说，这是西方人早已发现的原理，独立发现有什么意义吗？当然有意义。这就是，互相隔绝的发现更能印证这一原理是对的，具有普适性。还有一个意义是，茅老师是在对计划经济的思考中发现这一原理的。另一个人，兰格教授想把这一原理用于计划经济，或者“计算机市场经济”，即由中央计划者计算出边际成本是否等于边际收益。茅老师突破了兰格的局限，他在《择优分配原理》中指出，普通的家庭妇女就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让成千上万的经济当事人分散地计算和决策，这才是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

第二个贡献是，茅老师发展出了人文经济学。他没有停止在经济学基本原理上。他发现经济学的假设过于简单，假定人和人是一样的，或者相差不大。但现实世界中却不是这样。不同的人拥有的优势资源是不一样的。例如男人和女人拥有的暴力资源就是不一样的。在这时如果人们只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的经济人，不会达成资源的最佳配置，因为有些人会滥用自己的优势，而并不遵循市场规则。所以茅老师发展出了人文经济学，换句话说，叫作“道德自由主义”。茅老师在弗里德曼自由奖的领奖演说中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意思是说，只有当拥有优势的人不滥用自己的优势，才能达成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才能成全自由主义。

第三个贡献，是茅老师与其他几个经济学家和大象文化公司一起创建了天则所。二十五年过去了，天则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期。当初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推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现在看来不仅如此，天则所跨越了学科，也跨越了文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文化，可称之为“天则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很小。但最后取胜的传统不在大小，而在于是否正确。天则文化传统或许会在未来中华新文化传统的形成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四是茅老师不尚空谈。有些学者或理论家能提出非常伟大的理论来，但他们比较轻视实践。茅老师不仅有理论，而且认为要身体力行，他不以善小而不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具体努力能够改善人们、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状况。他创建了龙水头村的小额贷款基金，为贫穷的人解燃眉之急；他与一些朋友一起创建了富平保姆学校，帮助那些生活在最边缘、也最弱势的农村妇女。

第五个方面，是茅老师谦恭。他的谦恭不是做出来的谦恭，而是骨子里的谦恭。记得茅老师给我写的第一封信的落款就是“于轼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给我写邮件的落款还是“茅于轼上”。茅老师的谦恭表明，他真心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茅老师是长辈，有很大的学问，有很高的声望，但他不为外在的成就所动，而保持着谦恭的定力。

第六个方面，是茅老师的文字简洁明白。在座的多是写文章的，但只有茅老师的文字最简洁明白。这也是最美的文字。简洁明白还会使更多的人能够懂得茅老师的语言，使大众能够理解经济自由主义。如果没有干扰，茅老师微博的粉丝有两千多万。这使经济自由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第七个方面是善意批评。茅老师勇于批评，不怕得罪人，但同时他的批评是心怀善意的。茅老师的批评是最纯的批评，不掺杂其它想法，更不怀有恶意。所谓“善意批评”就是希望被批评者能够接受自己的批评，纠正错误，从而对被批评者本身有好处，当然同时也对社会有好处。这也是天则所的风格。我们有时批评政府或利益集团，有时可能会很直率，但我们绝没有恶意，而是心怀善意并且努力表现出善意。

最后我想说，我们祝愿茅老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我们同时也坚信，茅老师一定会长寿。为什么？因为经济学家长寿。例如科斯教授 103 岁，诺思教授 95 岁，哈耶克也 90 多岁。为什么？我想用经济学的四个核心概念来解释。

第一个概念是“均衡”。经济学家不相信某种要素越多越好，而是相信不同要素之间要形成一个恰当比例，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才能形成一个最好的资源配置。这种外在的不同要素之间形成的均衡，既始于内心，最终也要体现为内心的均衡。所以经济学家是内心均衡的人，也就是内心平和的人。他不会有不平的心态，也不会有极端的情绪。内心平和的人就会长寿。

第二个概念是“最佳”。经济学家相信有一个最优解决方案，有一个最佳境界。以此为标准，他会发现他身处的现实世界有缺陷，与理想境界有距离，他就有趋向理想境界的动力。这使得他感到人生有意义。茅老师曾经说过，他最终体悟到的“人生意义”，就是“享受生活”。他说的享受生活是山珍海味和灯红酒绿吗？显然不是。他说的是，朝着理想境界努力的过程就是一种享受。

第三个概念是“替代”。经济学家在说某种东西不好时，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替代方案。他不会只说东西不好，而不提出替代方案。只想把坏的东西去掉，那只是破坏；而提出替代方案则具有建设性。建设性对于一个社会来讲是健康的，建设性对个人来讲也是健康的。

第四个概念是“边际”。边际就是一小步一小步的试错。经济学不相信一口能吃个胖子，也不期待有一个超级英雄从天而降拯救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经济学家相信社会要靠人们自己一步一步地改进。因为他们不相信突然有一天有一个理想社会降临，他们也就不会因它没有降临而失望。他们脚踏实地，更相信通过他们一小步一小步的前进，能够一点儿一点儿地改进这个社会，他们也会在每一小步的改进中充满成就感。

所以，经济学家平和，享受，健康，满足，他们怎能不长寿？所以，茅老师会长寿。让我们举杯祝茅老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

2019年1月12日

[【返回目录】](#)

毛寿龙：自由的人生是有秩序的人生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本文为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毛寿龙〕



茅于軾先生九十寿辰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

2019 年 1 月 14 日，也就是今天，是经济学家茅于軾先生的九十岁生日。

茅老已经很长寿，而且一定会更长寿。因为盛洪说，经济学家总是长寿的。因为经济学家讲究均衡，最佳，替代和边际。均衡生活，保持最佳状态，总是有替代方法，重视每一分钟的生活。不长寿才怪。

当然，在我看来，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而且政治学家也是可以长寿的。其实，只要重视自由的学者，总是长寿的。

因为自由，让人保持内心的安宁，能够让人有责任感，对周遭的环境有天生的把控能力，从而适应任何不良的环境。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都能够保持乐观积极的心灵秩序，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而茅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前半辈子在艰难困苦中坎坷五十年，但无论如何困苦，他都能够专心致志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是把数学学好，一件事是把英语学好。

茅老说，他学好了这两个方面，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他的机会就来了。他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还可以有一个好工作，能够挣足够的钱，把家里的生活搞得好好的。

不过改革开放过了不久，茅老就退休了。但只是官方意义上退休了。自由的人从来不会退休。他不仅继续学习，而且还写作了大量的文章和书。尤其是 1993 年，茅老当时已经 64 岁的时候，还努力开创了一个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

所以，自由的人生，是内心有强大的心灵秩序的人生，也是一个自由秩序由内而外逐步扩展，从而给自由的扩展秩序提供心灵能量值的人生。

茅老九十岁了，最近这一年，大家经常给茅老过生日，和茅老一起吃饭，天天像过节那样。茅老很快乐，大家也很快乐。

这才是自由的人生，而且是有秩序的快乐的人生。只要每一个自由的人，在心里发动自由秩序的发动机，就可以通过生活和行动，给自由的扩展秩序贡献能量，从而为自由而美好的世界加砖添瓦。

祝茅老和赵阿姨生日快乐! 🍷

[【返回目录】](#)

笑蜀：推动市场向善 | 茅于軾先生最大的功德

[笑蜀 独立学者。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茅于軾先生 图片来源：中评网

古有三不朽之说，以其为人生最高境界。古人认为，要达到这一境界，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到极致，即立言、立功、立德。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多，今天就更少。

但是，无论古往今来这样的人多么少，茅老茅于軾先生，肯定是其中的一个。

首先讲立言。

毫无疑问，三十年言论界，茅老茅于軾始终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无论在言论相对繁荣的昨天，还是在言论开始荒凉的今天，这面旗帜从不曾退场，也从不曾褪色。

这是一面自由的旗帜。捍卫自由是她的主题。

茅老本来工科出身。他的一生历经劫难，见证了太多沧桑尤其黎民的苦难。他因此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强烈的家国情怀，而在改开之后、在知天命之年毅然改行，从工科转向了经济学研究。中国少了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却多了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思想家。

但就像从前不满足于做一个工程师，很快，茅老就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经济学者了。他认为，改革

研究是比单纯的经济学研究更紧迫的使命。如他自己八十周岁时所称：“我不是追求名声的人，得诺贝尔奖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想把中国搞好，让老百姓富起来，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弘扬改革的精神，这是我这 20 多年工作的重点。”

茅老至此从象牙塔夺门而出，一脚踏进了改革现实的滚滚洪流，以学者的理性直接面对公众发言，以传教士般的巨大热情与坚韧，普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常识。他写了 15 本关于市场经济的书，其中《生活中的经济学》是畅销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政府尤其向公众解释了什么是自由市场经济。

但茅老不只是常识普及者，更是一个战士。他坚信，中国问题的核心是自由问题，中国人民遭逢的全部苦难，都因为不自由。改革的方向必须是自由。是否真改革，改革措施是否对，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人民的自由尤其经济自由是否扩大。这在政府干预和均贫富传统极其强大的中国，无疑极具冲击力、极具争议性。茅老不得不一直行走于风口浪尖。无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的主张，还是 18 亿亩耕地红线不必要的主张，还是取消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不建厕所的主张，他提出的所有相关议程，看起来都不合时宜，都如巨石击水，激起轩然大波。

为此，茅老付出高昂代价，误解，抨击，乃至排山倒海的人身攻击，几乎无日不有。在讨论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某位政府高官竟拂袖而去。甚至很多误解和人身攻击，来自一些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人言可畏，但茅老无所畏惧，坚持独立立场，不向任何压力屈服，既不向权贵折腰，也不向民粹低头。

不能说茅老的所有观点都对。但今天回头看，他的很多主张确实得到了印证。他主张为穷人做事，这当然无话可说，为富人说话却遭到很多道德家的曲解和抨击。但茅老所说富人，并非通常所称的有钱人，而主要指创造财富的民营企业家。那时他就已经对国进民退的大趋势、对民企所处困境洞若观火，大声疾呼从舆论和道义上为民企解困。只是因为惨淡现实的教育，茅老的这点苦心，很多人后来才慢慢明白。其他如取消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不建厕所，18 亿亩耕地红线不必要等等主张，也越来越因真相逐渐大白，而为公众理解和接受，不再有争议性。

费希特说，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导师；不仅必须具有真理感，而且必须予以阐明、检验和澄清。具体到当下中国，一个经济学者的使命，首先必须是阐明、检验和澄清为什么必须捍卫自由市场秩序。这点，茅老做到了。正因为如此，他当之无愧地荣获了美国加图研究所 2012 年度弗里德曼奖。授奖辞开宗明义地说：茅老是中国推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活动家，直言不讳并影响巨大。两年后，英国《前景》(Prospect) 杂志又将茅老评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授奖辞同样肯定地指出：“85 岁的茅于軾是中国领先的个人权利、自由市场与政府改革倡导者。”

古人所谓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以之总结茅老，绝非夸张。茅老之为言论旗帜，无可争辩。但仅仅言者的定性，仍不足以概括茅老的历史地位。作为行动者的茅老，其在实践领域的成就，比之言论上的成就，并无丝毫逊色。

作为言者的茅老，主要是一个战士，一个批判者。但他不是基于对抗、基于仇恨和发泄。他所有的战斗，所有的批判，都基于他的家国情怀，基于爱——爱真理，爱人民，爱生他养他的祖国。这一点，决定了他不可能停留于简单的批判，不可能停留于仅仅提出问题。

这就有了茅老一生中的第三个不满足。第一个不满足，是不愿只是一个工程师；第二个不满足，是不愿只做一个经济学家。第三个不满足，则是不愿只坐而论道，而渴望做一个行动者，问题解决者，把平生所学、所思、所想，投入到具体的实践中，投入到具体问题的解决中。以此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并通过问题的解决来具体地推动变革进程。

行动者茅于軾，问题解决者茅于軾，就这样横空出世。于是有了后来众所周知的为富人说话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有了为穷人做事的山西龙水头村“造血式”扶贫，以及更大规模的永济小贷实验；还有了后来的富平保姆职业技能学校，成千上万农民妇女进城就业，成千上万农村贫困家庭从此脱贫。

显而易见，作为行动者的茅老，问题解决者的茅老，关注的焦点是贫困问题，尤其农村贫困问题，主要致力的是扶贫。小贷实验最初几年，仅仅他跟一线工作人员的往返信函，就多到可以装好多个麻袋。他为此付出多少心血，于此不难想象。

贫困问题是大问题，这早已众所周知，关键在问题如何解决？通常无非两张主张，一是借助政府力量的所谓二次分配，在今天主要体现为所谓精准扶贫。相应的当然是大政府体制，甚至所谓广义政府即全能政府体制。但这种举国体制代价极其高昂，不仅赋予政府过大权力，更会导致财富主要向政府集中。

另一种主张则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即通过公益慈善事业，主要通过所谓第四部门即 NGO，来救助弱势群体，实现财富的第二次分配。这相比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无疑更具优势，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最大问题，则是第四部门本身可能的异化，第四部门也像政府那样，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

这两种主张看似不同，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市场失灵——市场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创造财富、让财富极大涌流的功能。但市场在公正分配财富方面，在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方面，则是短板。换言之，这两种主张都基于对市场道德性的不信任。都要求在市场之外另起炉灶，要求把市场创造的相当比例的财富拿出来，交给其他部门，通过其他机制再分配，以此应对所谓市场失灵，尤其遏制所谓贫富分化。如果谁持有异议，乃至反对，很可能就被扣上一顶主张“市场万能”或“原教旨市场派”的大帽子。

但这两种倾向，作为自由市场捍卫者的茅老，并不能完全苟同。他不仅相信市场能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而且相信市场同样能公正地分配财富，同样能为穷人做事，同样能在实现公平正义方面起作用。即茅老并不怀疑市场的道德性。只不过，他的这些思考的结晶，主要不是体现于文字，而主要体现于实践，体现于行动，体现于别辟蹊径，既不依靠所谓精准扶贫，也不依赖所谓第四部门，主要通过市场机制，通过支持贫困地区农民创业，通过支持穷人自我造血，来让穷人脱贫。即主要依靠市场本身的

力量，来解决贫困问题。无论他所投身的小贷实验，还是他创始的富平保姆学校，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1993 年，茅于軾与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等经济学家，
与大象文化有限公司一起，创立了天则经济研究所

为富人说话，即为身处险境的民营企业说话，为财富创造者说话，茅老和他创办的天则所做到了。为穷人做事，这一庄严承诺，茅老也兑现了。千千万万穷人因为他的努力，开始告别贫困。茅老通过市场机制帮助穷人脱贫的努力，同时修改了对市场的道德性的传统定义，证明了市场向善、商业向善的巨大可能。而如果能够充分调动市场向善、商业向善的力量，这无疑是最普世、最强劲的向善力量，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净化市场、净化商业本身，更可以通过市场驱动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解决原来积重难返的种种社会问题，最大限度改造整个社会。它还将创造出一个新的趋势，即人心之善不仅具有道德意义，不仅可以奠定公序良序的巩固的基础；还可以为财富创造提供新的支点。越是向善，市场机会越多，市场空间越大。这就可以形成向善与财富创造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也是伦理学上的重大突破。

这并不只是一种乐观主义的预言。今天的社会创新，今天的社会创业，今天的影响力投资，无不印证着这样的客观趋势。一个市场与道德比翼齐飞的新时代或许离我们并不远。而为穷人做事的茅老，其在扶贫上的全部努力，都属于这新时代的艰辛开拓的一部分。

这就不仅属于立功，而且属于立德层次了。换言之，推动市场向善，是市场时代最大的功德。茅老

是这方面当之无愧的先知，当之无愧的先行者。所以，他不仅是言论界的旗帜，更是行动者的旗帜。什么叫知行合一？如何知行合一？茅老为我们、为整个中国知识界趟出了一条路，为整个中国知识界指出了方向。

茅老的一生，并不容易。前半生如果说不是九死一生，至少也经历了三次生死考验。后半生只有八十年代相对宽松，后来的岁月，跟大多数人一样艰难。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时代立言立功立德，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奇迹是如何成就的？这是一个大话题，值得写一本大书，非区区千字文所能承载。但笔者的直觉，这显然跟茅老的内心世界有关。熟悉茅老的人都知道，茅老曾是时代的受害者，那么多的坎坷，那么多的冤屈。即便今天，仍常常陷于舆论风暴的包围中，陷于各种恶毒的谩骂和诋毁中。但无论大气候小气候如何，在他的脸上，任何时候，都看不出一丝一毫受害者的痕迹。他那么勇敢，那么执着，那么坚定，但同时又那么平和，那么温润，那么从容不迫。没有什么能够把他打倒。内心得多么强大，才会有如此状态。

今年茅老满九十岁了。九十岁的茅老，依然红光满面，双目依然炯炯有神，行走依然坚实有力。思想着是有力量的，行动着是有力量的，思想并行动着，为博大的爱而思想并行动着，则可以有非凡的力量。这是茅老生命力充沛的原因吧。按照古人的说法，其实茅老已经当得起不朽二字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茅老不朽，茅老活出了凡人所能抵达的至高境界。如果我们也想在转瞬即逝的时间激流中，多少抓住些永恒的东西，不妨参考茅老，尽可能像茅老那样，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虽然，不可能真的抵达茅老的境界，但取法乎上得其中，至少总可以守住底线，在这溃败社会之中不至于堕落。这，或许是茅老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

秋海棠纪事 2019-01-14

[【返回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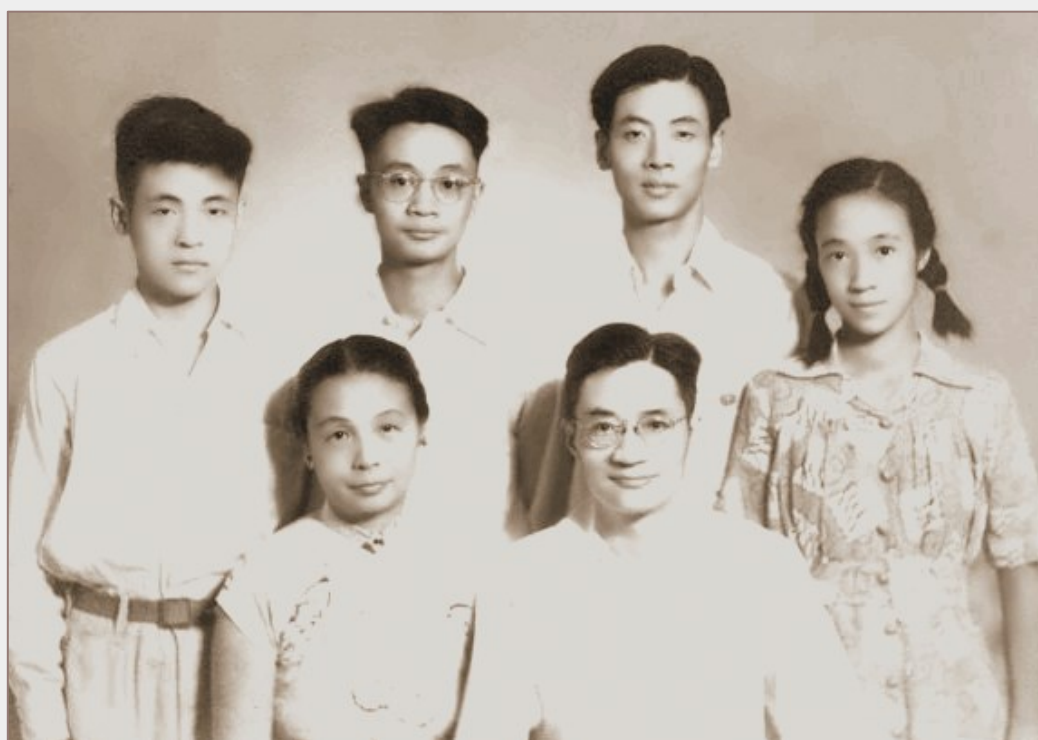
茅于軾：我的经济学是我自己发现的

[**茅于軾**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学会理事长。本文摘自《八十回望》暨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版，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 1902 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 6 个月。爸爸活到 1990 年，妈妈活到 1992 年。妈妈生了我们 4 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著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 1911 年 9 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每天要我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就给我一个铜板。我直到今天仍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应该说，祖母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她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 3 个儿子都是留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



茅于軾（后右二）四兄妹与父母。

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后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又去了加拿大实习，再从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工作上工作了一辈子。1950

年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竭力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而且都有留学生的背景，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的，且崇信科学。

学习和教育

我上的头一所学校是杭州狮虎桥小学。那时候我只有 5 岁多，只记得有一次我犯了错误被校长叫上讲台受训，我不服气，用小脚踩校长的鞋子以解气。校长倒也没有认真，哈哈一笑了之。后来父亲的工作调动，就去了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是 46 级的校友。总的来看，这 12 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 13 所学校。

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都是勉强及格。但是我对课外读物有兴趣，在小学四年级时就看科学杂志。在初中一年级的時候我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经常和几个同学谈天文学的问题，因为频繁转学，学习很受影响。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上海交大的四年教育。这四年的特点是老师好，听得懂，而且专业课全部用英文，做习题、考试都用英文，我的英文主要靠在上海交大这四年培养起来的。在交大学的力学、数学、热学、机构学(现在叫机械原理)都非常有用，甚至影响到我的人生观。

大学毕业后，我自己十分重视学习，天文地理无所不学。1955 年，我调到了铁道科学研究院，需要更多的知识，从那以后我坚持自学，至今不断。我看的书中以数学方面的书最多，另外还学了空气动力学、计算机和数值计算（我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就开始用计算机了，用于给试验数据加工分析）、燃气轮机，还学了俄文，都是很难啃的学问。近来看的书都跟经济学有关，另外感觉自己历史方面的知识太缺乏，因而看了不少历史书。铁道科学研究院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给研究人员提供系统的课程。我听数学课至少有四年，但是因为没有人指导，有些课费了很大的劲。我的数学基础对后来推导择优分配原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有机会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我听了三四门课，但没学到新东西，只有一门讲税务的课，觉得颇有收获。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税”的观念。在国外，我的主要收获是了解国际上的学术动态，结交了不少大学者，特别是明白了如何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出版物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书，至今未断。

1990 年，我应聘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作客座高级讲师。这是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我能够获得这个职位跟我认识他们经济系的主任有关。在哈佛大学时，我们在加拿大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相识，他知道我的经济学水平，所以请我去。我在那儿讲三门课：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环境经济学，都是研究生的预科课程。我的月薪按当时的汇率合 3000 美元，交掉 1000 美元的税，还剩下 2000 美元。一

个中国人，没有学过正统的经济学教育，没有博士学位，却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教主流经济学，这不但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恐怕至今也是凤毛麟角。

爱人赵燕玲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开织造厂生产绸缎的，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人问他家要过去织出的样本。

她家和我家不一样，日寇侵华时我们茅家全都跟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内地，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但是他们赵家全都留在了沦陷区，因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当局的是什么政权，能够有生意可做就好。1937年抗战爆发，那时候她父亲正在张家口开蛋厂，因为战争，于是卖掉了厂回苏州。她是家里头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又体弱多病，所以是家里最娇的娇小姐。她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但是她集全家宠爱于一身。

她是我的远房亲戚，是我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我称之为舅妈的女儿的三次方，反过来，我是她姑妈的儿子的三次方。我头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是我舅妈的儿子偷来给我的。以后又弄来一张，比较胖了一点，我见到之后当然羡慕不已。



茅于軾与赵燕玲

她的出身对她一生有很大影响。虽然她没有念大学，是中专毕业，但是人们都说她是大家闺秀，说她气质非凡。她从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到一家之主的贤妻良母，又到孙儿绕膝的古稀之年，一贯保持着秀丽端正、雍容华贵的风度。

她的恋爱故事可以写一本书。在无锡助产学校时同时追求她的有五六位男士，包括她的老师和医院里的医生等。她毕业之后之所以来到齐齐哈尔，也是因为追她的人太多，不好摆平，索性远走他乡。那时候我只跟她见过 3 次面，她敢于去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只能说是缘分。当然，也许跟我的表现有关。她爸爸看见我写给她的信，称赞我的字写得好。之前的一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对郑锡坤作业法“动能闯坡”的研究》的文章(此文我得了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稿费)或许也有关系。

1954 年她到了齐齐哈尔，成为齐齐哈尔最吸引人的明星。管理局周末的舞会总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长会告诉医院院长给她调换班次。到了北京以后她同样惊动了北京城，王府井三家最大的照相馆，在橱窗里都挂她的照片(不论她在苏州，在上海，照相馆无例外地都挂她的照片)，有人说她是倾国倾城，并不为过。

光说她的美貌远不是她的全部，她懂得人的心理，善于表达，善于沟通，而且非常能干。她为全家人织毛衣，为全家做各式各样的衣服，从衬衫衬裤到中山装。她是助产士，接生过 1000 多个孩子，没有出过任何事故，护士们都愿意跟她的班，她被评为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文革”后她主持家务，更是一显身手，全家的伙食极大地提高；她给我理发，自那以后我从来没上过理发馆，只除了在国外的两年她不在身边。

择优分配原理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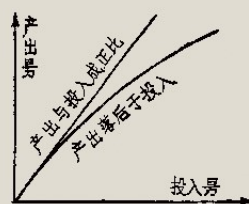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 茅于軾

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将一些能源消耗大，原材料利用差的工厂的生产任务减少，或者停办转产，而让生产效率高、成本低的工厂发挥最大生产效能，结果不但缓和了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而且保证了总产量和质量，增加了利润，收到了极为明显的效果。这个调整过程，实际上就是将有限的能源或原材料进行择优分配的结果。所谓生产任务的调整，实际是通过对能源、材料以及资金、人力、土地等的分配方案的改变来实现的。经济学中的大量问题都可从分配的角度来作出定量的研究。分配方案的优化改进，可以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效率。许多技术问题也可从分配的角度来研究。因此择优分配就成为一个最优化方法的原理或基础。

收益函数

经济问题的量化研究，必须引用数学中的函数概念。否则何者优何者劣，何者最优何者次优将

为收益递减律。它并不是绝无例外的，特别在生产组织方式改变或者采用新技术时，产出量的增加可能大于投入量的增加。但在大多数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确能反映投入产出之间数量关系的特点。这种数量关系在数学上称为曲线具有下凸性（或称凹性）。它由图一表示。



图一 收益函数的下凸性

由于曲线具有下凸性，曲线在不同点上的切线具有不同的斜率，如图二。在A点处增加一些投入

茅于軾在 1980 年第 12 期的《经济研究》中，发表了一篇题为「择优分配原理简介」的论文，

朋友成就学术

我原来是学理工的，所受的基本训练是在理工方面。我对所学的力学、电学、热力学、数学都认真地地下过工夫，可以说是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像《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弗洛伊德、韦伯、柏拉图、培根、黑格尔的著作。我的国学基础也只限于《论语》、《古文观止》中的十几篇，加上零零碎碎的《史记》、《孟子》等。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所以我在写文章时极少引经据典。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的知识不是抄袭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贩卖外国的原著，这些恶名都安不到我的头上。

我之所以能取得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和结交的朋友有关。我们互相交流，彼此得益。其中主要有王国乡、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盛洪等人。

我的学术成就大体上可分为前 25 年和后 35 年。前 25 年主要是在铁道机械、牵引动力方面；后 35 年则在经济学、人权、道德、制度方面。

当“文革”接近尾声时，工厂领导照顾我回铁道研究院作助勤，我等于就回了家。回到北京后，我在铁道研究院的运输经济研究所做助勤，从事铁道经济研究。

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完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时我正好 50 岁。我领导运输所经济室的学术工作，很有声色。我还给研究生开数理经济学的课(宋国青、张维迎、王国乡都来听过我的课)，给室内同事开概率论的课，去北京经济学院开数理经济学的课，我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我的研究领域越来越超出运输经济。

我常讲，我的经济学是我自己发现的。这个发现过程就是推导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我写的《经济学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一书就是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其特点就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用非线性规划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并得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从而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

[【返回目录】](#)

2018 《中评周刊》十大推荐文章

梁治平：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

（中评周刊 | 「新年期许」特刊 [上]）摘要

网上流行一个段子，大家可能看到了，说的是“低端”人群见面会问：你的房子还在吗？“中端”人群见面会问：你的孩子还好吗？而“高端”人群会问：你什么时候进去？不同的人群关心的问题似乎不大一样，但都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中国公民的我们的财产、自由、安全和尊严。

什么是说理？照我的理解，一个社会里的人遵循某种共享的规则而展开的表达、论证、说服活动，就是说理。说理是一种主体间的活动，所以它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思想方法、行动方式，更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样式。说理意味着社会主体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互相承认和互相尊重。你要承认对方的存在是合理的，承认其利益和诉求具有正当性，就必须倾听对方的意见。这也意味着某种基本的社会共识，某种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这又涉及社会凝聚、社会权威之类概念。所以，我们司空见惯的各种赤裸裸的压迫、压制，或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剥夺，在这里都是反社会的、不可接受的。我是把说理同非理强制和暴力这类东西作为互相对立的范畴来理解的。一个社会，说理进一步，暴力就要退一步。事实上，有人就以暴力的消、涨来作为人类是否进步的判断标准。可见对暴力的控制和抑制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的意义。

说理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它的非暴力性，实际上，它也反对各种非理的强制，反对各种横暴的权力，尤其反对用暴力方式来解决可以用说理方式解决的问题。说理意味着社会主体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互相承认和互相尊重。你要承认对方的存在是合理的，承认其利益和诉求具有正当性，就必须倾听对方的意见。这也意味着某种基本的社会共识，某种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这又涉及社会凝聚、社会权威之类概念。

造就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应该从国家的自我约束和守法开始，从国家的改造和转变开始。今天讲法治中国，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说理的社会，一个尊重说理、保护说理、对非理强制和暴力绝不容忍的社会。

李炜光：2018 期许：中国纳税人的自我启蒙之年

（中评周刊 | 2018「新年期许」特刊 [下]）摘要

感谢天则，头一回把期许会开到餐厅里了，这个无奈而有趣的经历会记录在天则发展历史上的……“纳税人”，跟这个名词相对应的另外一个名词是“缴税者”。纳税人是依据法律承担纳税责任、享有涉税事务的参与、问责和监督权利的主体；而缴税者只是遵从行政命令、履行纳税义务的主体，两者的性

质迥然不同。人类历史上，纳税人的历史较短，只是伴随现代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缴税者存在的时间则很长，草民、百姓跟它是同义词。启蒙我们人人皆知，开导蒙昧，明白事理也，而自我启蒙则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弗洛伊德说，“自我才是真正的我”。有自我感知才会形成自我的意识，而感知来源于人的生活的体验和对历史的反思。

国家通过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公共需要来获得征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税收就是国家提供这种服务的价格，公民依照这个价格来向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既然国民通过纳税来换取安全和秩序，作为付出成本的一方，也就理所应当地拥有自己的选择权。

现代税收原则大致有8个要点：1、**公民财产权在先的原则**。2、**普遍征税原则**。3、**公平原则**。4、**法定主义原则**。5、**正当性原则**。6、**轻税原则**。7、**小政府原则**。8、**公开、透明的原则**：排除政治特权和防范体制性腐败，在此基础上，确立可问责、可纠错机制，这才是最终目的。政治特权在财政领域表现的很是突出，我们国家大量资源实际上是被特权阶层所消耗的，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国家通过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公共需要来获得征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税收就是国家提供这种服务的价格，公民依照这个价格来向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既然国民通过纳税来换取安全和秩序，作为付出成本的一方，也就理所应当地拥有自己的选择权。公共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就是评判国家、政府的标准。如果当政者提供公共服务的定价过高或者质量过低，理应受到纳税人的质疑，并促使当局改变相关政策。纳税者的问责越是紧迫，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就越低，国民所保留收入增长的份额也就越大。

比税收“轻”“重”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和相关程序的构建当代中国在建构“现代财政”体制的进程中，若想跳出历史周期率，唯有实质性推进改革，唯有接受分权思维，唯有承诺：从此不再与民争利。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是好事，不是乱象。

许章润：低头致意，天地无边 | 谨以此文纪念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

（中评周刊 | 89、90期合刊）摘要

任何一种学说思想，特别是类如新儒学这类希冀有所作为的庞大思想体系,都至少不得不面对下述四项重大考验，而检验其德性，表明其成色，落定其功效

第一，无法回避对于权力的态度，而必得在道势两端取舍，于德位之间从违。尤当公权恣肆缺德之际，总不能做缩头乌龟，甚至于反而唯唯诺诺，响应风从；第二，必得正视社会苦难，包括面对恶政腐败之不公不义而慨然回应，发挥社会批判效能；第三，勇敢而深切地关注人性之恶及其政制形态，绝不能视而不见，集体失声，却袖手谈心性，逍遥扮鸵鸟；第四，最后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是，在回应与解决上述问题之际，对于程序和方式的选择，有关程序理性与正当程序的思考设计，其之是否切应贴合，有无目的与方法的背反之虞等等，展现审慎的方法论思考与深切的道德紧张。

综此四端，不妨说，了无新儒学的声音，现今中国的这拨新儒家大多不合格。其之信誓旦旦，要么缅怀曾有的儒门阔绰，继续徜徉于悲情叙事，汲汲于恢复往昔的思想中心地位，而无视其之面对现实之苍白孱弱，早无解释迎应之力。因而，此番作业，无异于以学术公器谋取一己之私，迹近笑话。要么奴颜媚骨，佯论“只要尊孔，就当合作”，彻底放弃价值判断与道德立场，进而不明所以地礼赞领袖，公然为威权放歌，无视政体转型尚未完工与近年国族整体局势逆转之严峻，大言不惭“终于迎来了最好的时光！”经此仿佛一拍即合，在在暴露了千年延续的无骨市侩吃教陋儒本相。若说“判教”——一现时代条件下，新儒学居然祭如刀锋的一个谰妄念头——则此脉者流，恰恰了无原典儒义之刚健正大，违迕了以德抗位的圣人之教。再者，在此作业过程中，不是将儒学儒义当作理性领域，却奉之如教义，概为其心智缺陷所在，而根本背离了儒义本当蕴含的启蒙意义。

此间堪为要害而得引申的，不外私产之不可侵犯与自由之天经地义。无论是以国民财富的创造传布、分配消费最大化为目的的货殖经济，还是追求平等尊重与幸福生活的自由权利，包括公民横向联合方式的自主选择及其天经地义，悉均深植于人性之自保自强，而善自发育，进而涵养出社会政治目标与社会政治设置。它们不仅展现了人性的洪荒伟力，也是对于人性惟危之深度忧惕，表明的是人性之浩远深邃及其无可奈何。就此而言，尊重私产而赋予私产以神圣不可侵犯之位格，一如尊重公民自由，营造共和国的共同自由，才可能祛邪匡正，就是尊重人性，也就是在保育涵养正派人生。反之，则为蔑视人性，践踏常理常情，在在反人类也。

择善而从，昂首做人，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此而言，你我他，男与女，咱全国老爷们，吾亿万万血肉同胞，置此邦国，值此时代，遭逢当下，均难逃其责，亦难辞其咎……

郭于华：居住的政治：维权行动与私人生活空间的公共转化

（中评周刊 2018 | 第 56 期 [2018 年 3 月 9 日在天则所第 592 次双周论坛的演讲]）摘要

居住，本来是一个很私密的生活空间，但是它怎么发生了公共空间的转化，或者公共性的转化？它跟政治是什么关系？我们在研究中使用了“居住的政治”这样的标题……被拆迁户的抗争，形式比较多样，有个体性的，有日常化的，还有集体的，也包括上访、诉讼、街头抗议、集体上访、联署公开信、万人诉讼、万人举报；从个体化、分散化的，演化为群体性的或者是公共性的反抗。比如北京的万人诉讼，发展到1万多人后来达到3万多人，共同起诉的方式。

北京市的拆迁，理由特别荒谬，用“危改”的名义，好像是在为民谋福利，这是一种标榜。那些房子危吗？危与不危，谁来决定？有一些个案特别能够凸显普通的业主或居民，他们的权利意识的生长。一个著名的案例是黄振云先生被强拆的案例，他祖上留给他的房屋好像是清代的建筑。强拆队来了，警察也来了，老先生悬挂一个国旗，从宪法里摘出“国家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大字写了放在门口。他

擅长曲艺，自己编了一个京韵大鼓，名字就叫“被拆迁的人们”，然后在那演唱，聚集了很多，不光有跟他利益共同的，也有很多其他围观的人，甚至当时强拆队都被唱的很受感动。这一次，就没拆成，强拆队撤了，因为人太多。当时的媒体还对这个事件做了报道，据说还要把他挂的那面国旗收藏起来，说是公民用宪法保护产权的事件，值得纪念。第一次强拆失败之后，黄先生就把“公民合法的私有产权不受侵犯”这句话直接摘出来写在小黑板上；有关部门也写标语：“顾全大局，尽早搬迁”，可以从对比上看到非常有趣的现象。之后又有人把顾全大局给盖了，写着“捍卫宪法，保护私产”的红色大字。但是最后黄先生的房子还是倒在了推土机下。

这行动者自身也有很清晰的表达：他们说法律是要用的，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如果不用，你永远是一个草民，要么是草民、顺民，要么就是暴民、刁民，总而言之，你不是公民。

哪怕是一个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是有法律保护的。很多NGO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不让民政登记，就做工商登记，变成一个类似于公司的组织。今天很多NGO组织，它的困境一方面是政策越来越严苛，限制和禁止使用境外基金会资助，从资源上就被卡住了。在今天这样一种情境下，社会的自组织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阿伦特说的，“占有财产意味着握有一个人自身生活的必需品，因而潜在地成为一个自由人。……私人财富成为进入公共生活的前提条件”。一个人在拥有了自己的财产之后，才可能形成独立的人格、自主的表达意识，才可能积极关心自身的利益并参与公共讨论。

土地按照1982年宪法，就是国家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怎么就变成国家的了？土地怎么就国家有了？它是经过转让了？经过买卖了？还是被国家没收了？都要有个程序吧，都得有个证明吧，我把地卖给你了，要签合同，必须有手续。你没收了，也得有个收条吧，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变成了国有。

“行动锻造公民，抗争生产社会，维权改变中国”，还要再加上一句，“无私产无人权”。

郑也夫：鸿鹄、质疑，与一段往事（中评周刊 | 第61期）摘要

看过林建华校长的道歉信，我同很多网友一样，认可其文风质朴和态度坦白。但是也正是从其坦言中，我发现了一个远比白字更大的问题。

道歉信中他说：“真正让我感到失望和内疚的，是我的这个错误所引起的关注，使人们忽视了我希望通过致词让大家理解的思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而我以为“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是比念一个白字重要百倍的事情。

质疑是怀疑精神的体现。马克思在对他女儿的自白中说他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没有怀疑，何来问题；没有问题，谈何解决。密尔说：即使是一

个千真万确的道理，经怀疑后接受，和当作教条来接受，是大不一样的。对一所大学而言，怀疑精神是至关重要，它当然会“创造价值”。而恰恰是在面对怀疑精神上，北大的多数教师们与管理者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林建华校长的坦率，让我们领受到更大的震惊。因为林炎志先生是私下与一个朋友切磋此事，而林建华校长是面对全校师生、乃至全社会，堂而皇之地宣讲“质疑无价值”的人生观、世界观。

近期，敝人写于十年前的一篇旧文“丑陋的北大人”在网上传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那一年我系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有虚假成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结论是推迟半年毕业，重写一篇论文。系领导在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下否决了答辩委员会的结论。系内矛盾上交到学校，与我们约谈的就是时任副校长的林建华先生。这是我与林校长的一面之缘。林校长当时态度平和、不站队。但过后教务部的领导竭力劝说这个答辩组的教师放行作弊的同学。因认为这是校方的意思，林副校长的形象在我系这些教授心目中一落千丈。

接下来披露一下过后发生的，也是我从未讲述过的事情。

当时是两名本科生涉嫌抄袭剽窃。有一名的论文好得出奇。参考书目中外文书几十本，更有海量的亲自调查的材料。答辩会上，这两方面都漏出马脚。最后一刻我问她：调查有录音或笔记吗，还保存着吗？她说有。我说：回宿舍拿一趟。只要有调查记录，任凭她论文中的其他不实之处，我都准备放行。但直到最后一个学生答辩完毕，她也没有回来。此时该同学已经获得美国大学的全奖。而答辩会上的结论是重做论文，延迟毕业。稍后该生又伪造了调查采访的录音。随矛盾上交，此事在我系师生中成轩然大波。

在几方对峙，我坚持不退让之时——我的态度系内师生皆知，该同学来电话要和我面谈。我一再表示不同意面谈，她再三再四地坚持，最后她来到我家。见面后就说：我是作弊，我钦佩您的态度和眼光，我只对你一个人讲，我也必须对一个人讲出此事，不然我心里堵得慌。在教务部和我系教师座谈会上，我只分析论文，不谈该同学和我的谈话，因为那是私人谈话，不该作为证据。经过激烈争论后，达成妥协：两名涉嫌剽窃者，刚才说到的那位延迟毕业重写论文，另一位放行通过。放行的这一位，日后到香港读书，一年后再次作弊被学校开除。如此结局，让人唏嘘。

拙文“丑陋的北大人”中那一段落的结语是：“同在一个校园中，大家对北大名誉的理解与珍重竟存霄壤之别。”这里加上一句：大家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也存霄壤之别。

张干帆：从马克思到列宁（中评周刊 | 第 65 期）摘要

在欧洲乃至英美，虽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暴力革命不再情有独钟，但仍有不少人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个人怀有难以割舍的情结，似乎一旦放下马克思，左派就失去了抗衡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不平等的社会和理论资源。

我的法国好友张伦教授发表的《自由的马克思，专制的马克思》，也提醒人们注意“官方”和“民间”的两个马克思版本。不过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我实在没有看到什么“自由”。1872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工人大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自由演讲”，但是除了大概被后来安上的这个标题之外，全文里一次都没有提到“自由”。这篇演讲确实提到了英美或荷兰“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但他马上补充说：“我们必须承认，在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我们的革命杠杆必须是暴力；为了建立劳动者的统治，我们总有一天要诉诸暴力。”此时，已经54岁的马克思不仅没有放弃暴力革命主张，而且还承诺自己要为社会理想奋斗终生，直至“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实现统治”。

这听上去和列宁的说法差不多，但是今天马克思所得到的同情远比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更多。毕竟，马克思只是思想家，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要为行动及其产生的后果负责？尤其在一个理论和实践南辕北辙的国家，人们很容易认为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的名号都被政治权力“绑架”了。不过这并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是马克思？近代历史上思想家那么多，为什么卢梭、马克思等人的理论那么容易被“绑架”，而我们从来不见洛克、孟德斯鸠乃至密尔的学说遭到类似的误解和利用？或许列宁歪曲利用了马克思理论，但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及其终极诉求本身是否也要对这种曲解负责呢？事实上，马克思之所以在当今世界范围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主要并非是由于他的理论贡献。马克思的影响力恰恰来自列宁，来自列宁等人将其理论付诸政治实践并一度成功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模式。虽然“马列主义”的提法在今天未免显得俗套，切割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想当然的那么简单。

马克思无疑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有着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理论是极不成熟的……

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夸大了个人的无能为力，因而没有给政治和社会留下任何发挥作用的独立空间。经济决定论制造了一个极为消极的国家观和内在矛盾的人性观，由此衍生出一个终极意义的无政府极乐世界。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的自由只能在没有阶级压迫的无政府状态实现，因而从古至今，根本就没有“国家”——自由正义的国家，可能有的或者是统治阶级压迫、或者是无阶级“自由”。经济决定论的一个总结是，自由国家是不可能的，在本质上，国家就是维持阶级剥削的工具。

马克思的经济社会结构分析仍然具有生命力，但是从这个学说中实在找不到自由民主政治的基因。

金雁：“追问自己在历史中的责任”（中评周刊 | 第68期）摘要

1990年1月示威民众占领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总部大楼，迫使秘密警察解散，阻止他们销毁档案，目前保存下来的告密档案大约有185公里档案柜长，大约1.55万麻包撕碎的档案，还有47公里长的胶卷，照片160万张。大量的卷宗详细的记录了告密的“线人”被招募、领取薪酬、跟踪、窃听、

汇报的种种行径。

1989 年时大约有占总人口 1/95 的线人，18.9 万人，具有线人行为的数量会更大，但各个时期会有不同。东德时期“主动告密”的绝不是少数，自愿告密者认为，只要充当了政府的眼线，起码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孰不知线人背后又有线人，盯梢者背后又有盯梢者。所有的高官更是被建立了秘密档案，只要政治需要，在台上受万人仰慕的大人物沦为阶下囚只在瞬间。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可知的恐惧中，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成为装在卷宗里的“黑材料”。

这种把所有人当作“敌人”一样防范，靠“圈禁”起来和“特务政治”的“维稳”手段一经公开，民德统一社会党的合法性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践踏人权的现象是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经不起“公开性”拷问的。另外，控制社会的成本越大，链条越长，就越不真实，分析辨别的能力就越差，体系便容易走入“情报误导、误判”的死胡同。

斯塔西的档案现在成为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只有在过去的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才能更好的更好地走向未来。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牢记它并不是强调仇恨，而是为了让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屏蔽真相，遮盖真相，歪曲真相，以记忆模糊叫人遗忘，以谎言代替真相，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看到这一切，知道我们从什么样的历史中走来。

东德谈之色变的怪物“斯塔西”已经死去，但是在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斯塔西在兴风作浪，对此我们要谨记斯塔西管理委员会罗兰德先生的话：“历史与现在有绝对的联系，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有什么样的公共记忆就已经预设了未来的道路”，“在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让民众们记得我们曾经生活在惊弓之鸟的环境中，要让每一个人尊严的生活，就不能无视体制魔爪下的罪恶”。

何光沪：从宗教角度看人工智能（中评周刊 | 2018「新年期许」特刊 [下]）摘要

我想从宗教角度来谈谈人工智能，意在提醒：我们必须“学会自我规限，预防灭顶之灾”。

世间万物都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只有人是这样。人同万物的不同之处，即万物所无、只有人才具备的性质，就我们现在了解的来说，至少有三点：一、自由，就是一事当前，不由法则来决定，而由意志来选择的能力。人虽然不按自然法则行动可能会吃亏，但人的意志可以选择，顺从或者违抗法则。二、心智，它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心”，指的是情感、想像、良心等非理性的能力，另一部分是“智”，指的是计算、推理、谋划等理性的能力。三、“创造性”，就是制造或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的能力。

关于上帝“形象”的说法，以及伊甸园的故事都表明，人应该对自己有所规限，而不应该滥用自己的自由。

在这个时代，人开始把人性第二部分的一半以及第三部分，即心智所包含的“智”（如记忆、推理、

计算、谋划，甚至理解和学习等能力），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创造性，交给了机器。当然，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还未能把人性的第一部分，即自由，赋予人工智能；人类还没有，还未能把人性第二部分的另一半，即心智所包含的“心”（如情感、想象、良心等等），赋予人工智能；因为人类还没有、还无法完全摆脱自己的局限。而且，人的造物即人工智能，还离不开硅或一些稀有金属作为物质原料；这说明人工智能也还没有，还无法摆脱一些基本局限。

从宗教哲学角度出发，我现在还看不到赋予人工智能以“良心”的可能性。我们还必须考虑，从负面说，怎么防止人工智能获得所谓的“自由”。给予它们“良心”，让它们对人类友好；不给它们“自由”，以免它们滥用自由而反叛人类，这是我们必须思考、必须做到的事情。

“人工智能很可能导致人类的永生或者灭绝，而这一切很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发生”。不能只图人工智能正面的利益，而要警惕人工智能负面的结果，这样才能防止全人类陷入灭顶之灾。

张维迎：没有思想市场，世界会怎么样？（中评周刊 | 第 76 期 2018 年 8 月 23 日）摘要

任何社会变革，都从观念的转变开始。观念是思想市场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市场从古到今一直存在。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思想市场的竞争程度或者自由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有些国家的思想市场竞争性比较强，有些国家比较弱。

西方出现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其基本特点是，多中心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并存。相反，中国的思想市场却经常受到太多的约束和干预。

西方的知识生产主要在民间(包括教会办的大学)，中国的知识生产主要在官府。活字印刷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使用，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版在民间，都是私营企业做出版，为了传播知识；而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出版主要由官方控制，出版是传播政令和控制思想的工具。在西方的思想市场上，学者追求新颖，总会有人来挑战现有的理论，包括亚里士多德体系在科学革命以后就被抛弃了。而中国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证明原来的理论上。

计划经济之所以给中国造成灾难，很大的原因也在于当时没有思想市场。如果允许表达不同意见，肯定会有人会提出批评，这事儿就搞不起来或者只能在局部搞；但不允许批评的话，往往会在一条路上走到黑。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改变人的观念，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

任何思想都是个体思考的产物，集体不会思考。一种有价值的新思想在出现之初，一定只被少数人接受。如果没人反对，往往说明这套东西不是新的。这是任何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所以，学者必须有独立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对人类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中国更长远的未来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中国现在非常需要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术企业家，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他们创造新的理念，新的思想，还需要有冒险精神。如果大家都不愿这么做，那就依然有可能回到历史的反复之中，改革开放只能成为历史长河里令人回味的好年景。

资中筠：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是纳粹“成功”建造的两根柱子（中评周刊 | 第 81 期）摘要

顶层一个被神化的，为万民所景仰的领袖，由两根柱子支撑：一是民粹主义，一是国家主义，都推向极致。用民粹主义把底层百姓煽动起来，用仇恨对准一个敌人；国家主义为对内剥夺基本人权，对外发动战争的一切暴行提供“崇高”的借口。

没有经过启蒙的民众，不用理性思考，没有法治观念，很容易被煽动，成为法西斯的基础。有的时候，那些饱学之士也不见得不犯糊涂，对全民来说，诉诸国家主义，打出爱国旗帜，是非常有效的，谁也不敢反对。对下层来说，民粹主义，劫富济贫，特别有号召力。因此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是足以祸国殃民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的两大危险。

希特勒思想的特点：1.极端种族主义。2.完全轻视或抹杀个体。3.厌弃议会民主。4.蔑视法治。5.特别强调宣传的力量，明确主张欺骗群众。6.动员民众不能用爱，而要用仇恨。7.不相信国际和平。

希特勒认为自己看穿了社民党的虚伪和蛊惑群众的伎俩，由此，他对群众心理有一段精彩的分析，概括起来就是：广大群众的心理和女人一样，不会为抽象的说理所打动，而只能为强有力的、不容置疑的力量所折服。犹如女人在感情上渴求强有力的男人一样，人民群众宁愿被统治，而不要被恳求。接受不容置疑的说教使他们在精神上有安全感；给他们自由选择权反而使他们不知所措，而会感到被抛弃。他们不会以思想上受恐吓为耻，也不会意识到自由权利和人身受到侵犯。他们不会怀疑整个学说的谬误，而只为宣扬这一学说的那种专横的气势所慑服。

试行对比，“文革”许多因素都具备，几乎许多特点都可相对应：神化的领袖、失去理性的狂热的群众、盲目的信仰、任意加罪的敌人（血统论与种族主义异曲同工，把某一种或几种人定为敌人，由身份标签决定，与行为无关），砸烂国家机器，打乱社会秩序，各级行政长官都失去权威，以领袖的名义派联络员到各地各单位，全民都是一个领袖的“好学生”，消灭文化遗产，背离一切传统伦理道德，煽动仇恨，崇尚暴力。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不留空隙，直到“灵魂深处闹革命”。有一点不同，是希特勒建立了“新秩序”，而“文革”没有建立起来，天下大乱没有达到“大治”，为后来形势扭转留下空间，是中国人的幸运。■

[【返回目录】](#)

盛洪：如何扭转经济颓势？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 2019 年 1 月 22 日**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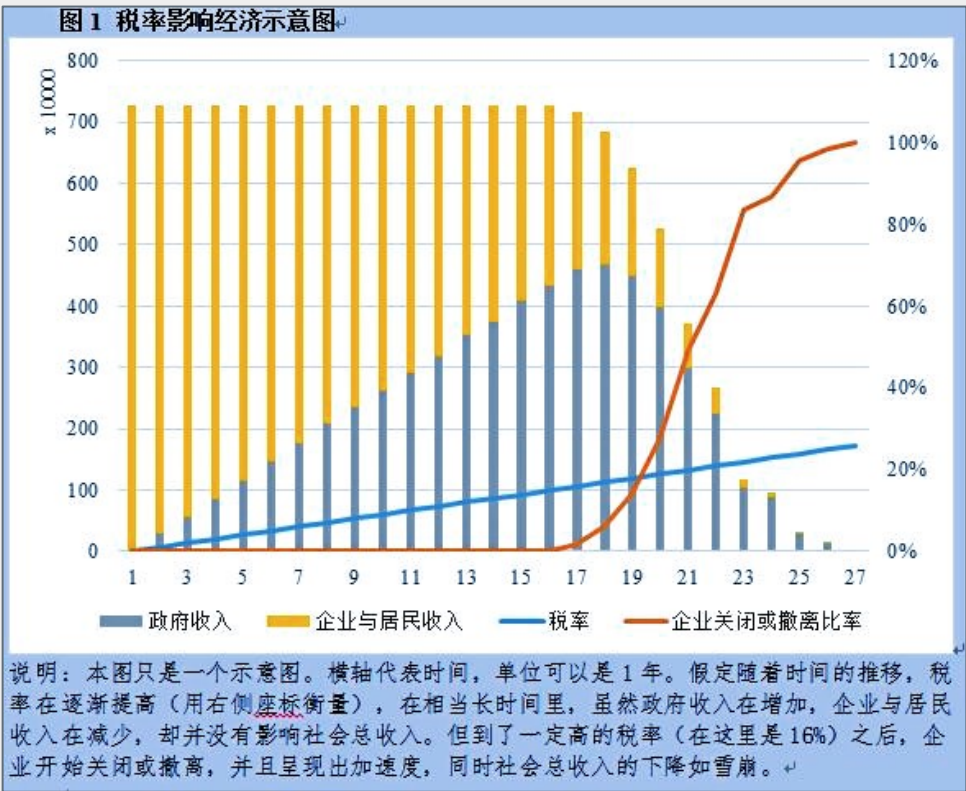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盛洪**与**科斯**教授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严重下滑，似乎已经无异议了。2018 年的经济增长究竟是多少，现在还是有多种判断。如国家统计局说是 6.5%，向松祚说某机构的估计是 1.67%。我计算的“**克强指数**”（注一）是 3.6%；而对“**克强指数**”的一个重要分量——发电量做了修正（注二）以后，“**克强指数**”约为 -1%。现在的任务就是扭转经济颓势。对症下药的政策显然应在正确诊断基础之上。我一直强调，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没有完成，由于中国具有在国际贸易上的“**巨国效应**”，我们还有 15-2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成长期。这两个优势一直是我们经济的增长基础，带来每年 5-6% 的增长。既然有这样的增长基础，为什么中国经济在 2018 年会下滑呢？

在我看来，主要有四个因素。第一是税负过重，第二是对民营企业的不友好，第三是逆城市化政策（如限制城市规模），第四是对网络经济的侵害和限制。对于第一点，我在《政府份额膨胀，利润空间将尽》一文中详细论述；关于第二点，我在《如何让民营企业家相信政府》一文中也做了讨论；关于逆城市化政策，我在《小民生计，大国根基》一文中也有所讨论；关于对网络经济的限制，我在《中国的两种经济》一文中讨论过新经济的正面影响，我将撰文专门讨论限制新经济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国有企业问题，一是土地制度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会带来相当于 GDP 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速，只是这两者都是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并不是 2018 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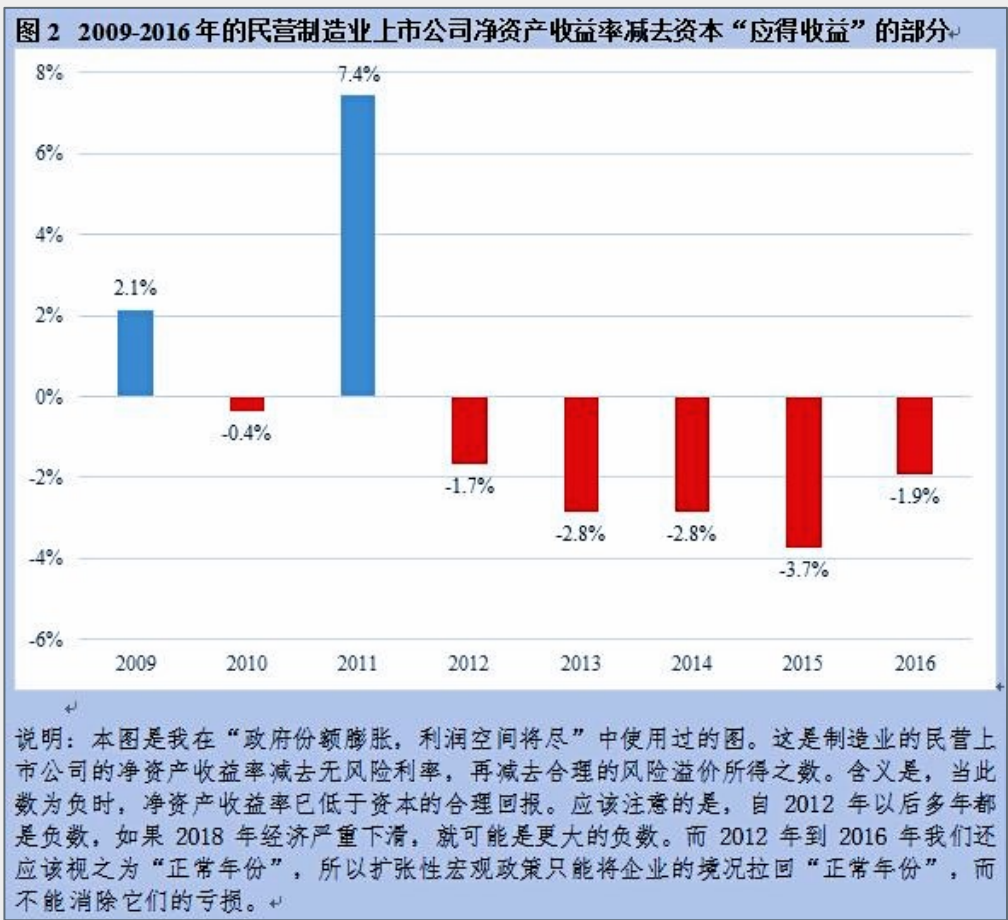
针对这四个主要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很清楚。针对税负过重的问题，就要大规模减税；针对民营企业的问题，就要改进司法制度，让它真正能够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针对逆城市化问题，就要停止现在这种限制城市规模的作法，这是直接抵消城市化过程正面影响的政策；让城市向所有人开放，并采取其它特定办法解决城市单一资源不足的问题；针对网络新经济发展的限制，就要认识到网络经济形成的产权同样是产权，同样要得到像产权那样的保护，也要像保护实体市场那样保护网络市场。

然而，现在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这四点，得出的政策建议就很不相同。如对税负过重有两种很不同的看法。一种就是承认重了一些，超过了拉弗曲线的最佳税率点，但并无大碍，不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税负重了的结果只是让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少了一些，导致消费疲软，但这可以用扩张的宏观政策来弥补或替代。而另一种，即我的看法则是，税负过重的含义，不仅是高于最佳税率，而且高到企业已经无法生存的地步。即企业已经没有利润空间了。这两种对税负的不同看法也导致了对经济下滑性质的不同判断。认为税负不是经济下滑主要原因的看法，也就认为这种经济下滑类似于一种周期性的衰退，所以可以采取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减缓和对冲；而认为税负挤掉利润空间的看法，则认为企业会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大量关闭或撤离，导致雪崩式的经济下滑，而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所以必须采取减税措施。具体的逻辑请看下图。



在企业没有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如果只是采取扩张性宏观政策，在市场决定的总需求基础上增加一点反周期的需求增量，只是部分地增加了企业的订单，但由于税率居高不下，仍然没有利润空间，企

业增加一单位的产量只能增加一单位亏损，企业就仍然没有动力扩大生产，也就不能从宏观层次提振经济。因为扩张性宏观政策并没有改变政府与企业居民间的分配格局，企业仍处于没有钱赚的境地。也有人会说，扩张性宏观政策带来的新增需求会减少设备闲置率，从而减少平均固定费用。实际上，鉴于宏观政策只是反周期政策，只在经济衰退时采用，则该政策带来的需求增长不会带来超过在正常情形的需求量，也只不过将企业的设备闲置率降低到正常状态。下图是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本“应得收益”（无风险利率+合理风险溢价）情况，该图表明，自 2012 年以后这些企业的资本就得不偿失，时间长度也接近一个中周期。我们所看到的资本“应得收益”意义上的亏损，就是在正常状态下的亏损，所以扩张性宏观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亏损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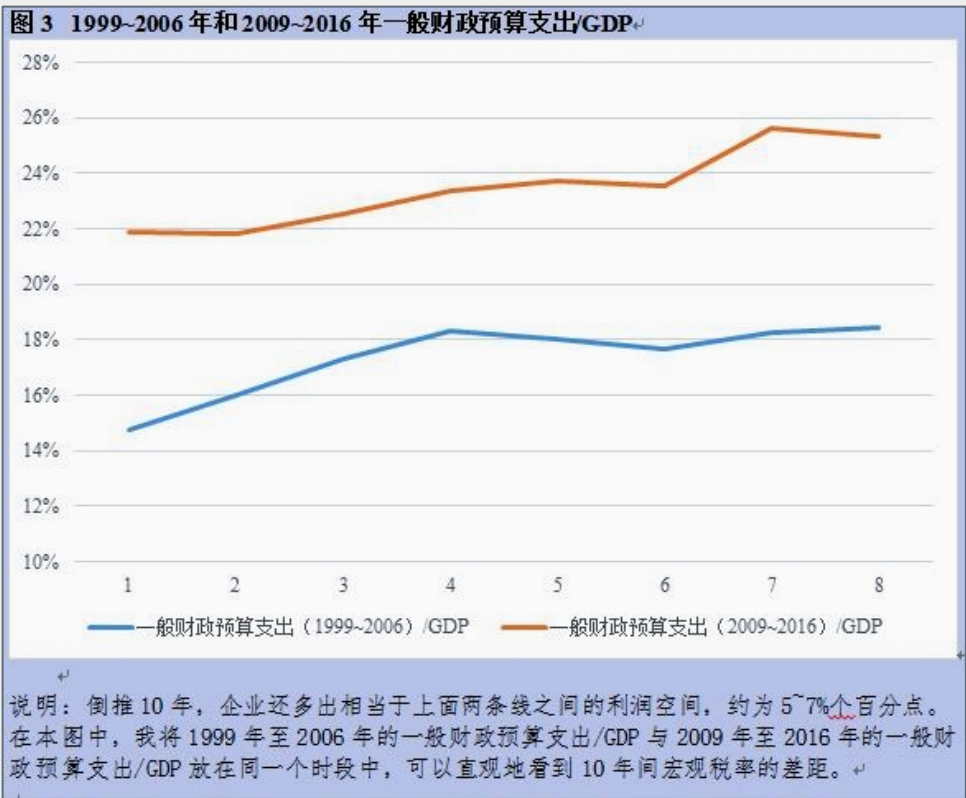


更细致的分析是，扩张性宏观政策会在需求萎缩时增加补充性需求，减缓衰退带来的冲击，但只能减少固定费用的分摊，而不能完全抵补固定费用（折旧+资本成本+管理费用）的分摊。因为如前所述，资本已经无合理回报。在这时，尽管企业可以将已经投入的固定费用视为沉没成本，不去计较，只要在当下价格下能够弥补变动费用而有余，就可以继续生产。但企业家不会再进行新的投资，因为资本无利可图。这在宏观上表现为，扩张性宏观政策可以刺激短期产量增加，却不能刺激长期的生产能力的增加，这就不能根本解决经济下滑问题。更何况，根据理性预期理论，宏观政策只能“出其不意”，只有在企业和居民不能预见的环境下才起作用，如果政府事先就宣称采取扩张的宏观政策，企业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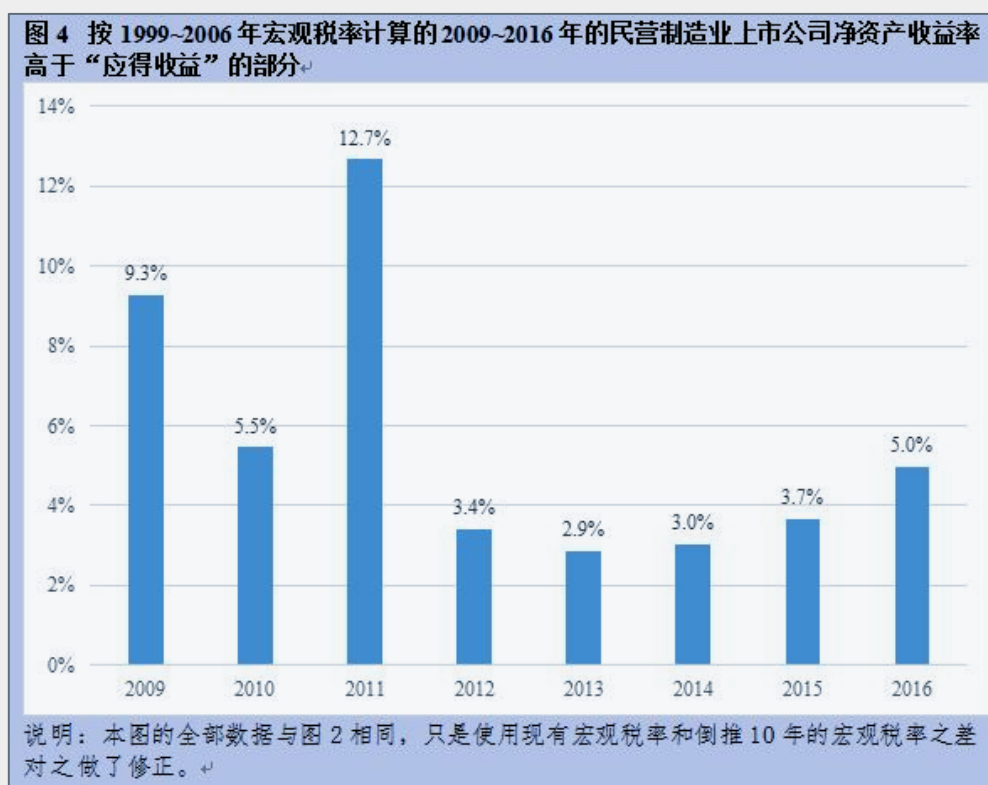
会被新增的需求所迷惑，而贸然采取增加产能和投资的决策，而是提高价格。如此一来，经济并没有增长，价格却上去了。这就是滞胀。

关于扩张性宏观政策，在经济严重下滑时，宏观货币政策实际上也不会产生多大作用。因为货币供给量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周转速度。中央银行只能影响基础货币的发行，而货币周转速度则取决于市场制度的效率和人们的预期。当人们普遍悲观时，货币周转速度就会变慢，从而抵消中央银行的扩张政策效果。更何况，在市场制度受到削弱的情况下，货币周转速度也会减慢。除此之外，就是宏观财政政策了。我们知道，这更有问题。第一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就要求有更多的财政资源，这就极大地减弱了减税的动力；第二是，如我们在 2008 年所看见的那样，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强调增加需求，而不太顾及财政资源的投向以及相关的效率。一方面财政资源更会借重于国有企业的渠道，而国企的效率却相对低下；一方面在政府决策和应急的背景下，财政资源更有可能投到错误的方向或产业，造成进一步的生产结构扭曲。

有人会说，2008 年的“四万亿”扩张性财政政策不是避免了中国的经济衰退吗，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呢？如果说“四万亿”还有正确的地方，那就是时机还对。因为仅根据一般财政预算支出，中国的宏观税率在 2008 年要比现在低 6.2 个百分点。（在本文中，“宏观税率”包括一般财政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国企机会收益和社保。在这里，我们假定后三部分占 GDP 的比例不变，把一般财政预算支出的变动当作宏观税率的变动。）我们倒推 10 年，1999 年到 2006 年的宏观税率，要比 2009 年到 2016 年的宏观税率低 5-7 个百分点。见图 3。因而在那时，制造业企业的资本收益还在“应得收益”之上，资本既有利可图，企业也就还愿意扩大生产和投资。



在这样的税率下，企业的资本“应得收益”得到满足。图4的大部分数据与图2相同，只是采用了10年前的税率。因此，10年前采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增加了订单，还增加了利润，还会促使企业增加投资和产能，从而使中国避免了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经济衰退。但今非昔比，在宏观税率比10年前高出5~7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再采取所谓“四万亿”的政策，就不会再有当初的效果了。我们也可以把图2和图4中的数据看作是企业家决策时进行计算的基础，他们会按平均值计算他们投资的期望收益。而实际收益则是围绕着期望值波动的。当期望值低于资本“应得收益”时（如图2），他们就不会进行投资。



当然，已经有很多人指出，“四万亿”政策还有很多弊端。一般人都把扩张性政策看作是需求政策。实际上从来没有孤立的需求侧政策或供给侧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大政府支出，包括公共工程支出，增加国有企业投资实现的，因而首先是对供给的影响。由于侧重于对需求的刺激，由于凯恩斯的“挖坑填坑”的经典比喻，使人们一般不关心，政府或国有企业增加支出带来了什么。在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和国有企业较少考虑投资项目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它们也不在意是否赚钱，所以很显然会比市场决定的投资的效率低得多，从而导致资源错置。而一旦投错了方向和产业，政府和国企又很难轻易退出，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供给结构的严重失衡，和所谓“产能过剩”。这在今天不仅是国内经济问题，甚至成了国际经济问题。很显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不能解决供给结构问题，反而还会加重它。

还有一种看法，就是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减税。它的问题是，减税要求减少财政收入，而

扩张性财政政策要求增加政府支出；这中间会加大财政赤字。这本身就会牵制减税幅度，使得减税力度达不到应有的程度。即使不顾赤字增加而同时实施大幅度减税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大量赤字本身就会带来新的问题，以致不仅抵消两项措施的好处，并且还有其它损害。例如对冲赤字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借债，一种是增发货币。对于政府借债，早有“李嘉图等价”证明，借债不过是推迟的征税，其效果与征税是等价的。布坎南承认，“征税”和“推迟征税”还是有区别，这是现代人借钱后代还，会给人们以“财政幻觉”，以为公共物品更便宜了。但结果就是会促使政府征更多的税。更何况，政府增加借债就挤占了货币市场的资源，从而使利率上升，导致企业的财务成本上升。因而，借债以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最终会把减税带来的好处抵消掉。

而所谓“增发货币”，是在合理的货币增长速度之上的增发基础货币，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如前所述，在经济衰退的初期，由于普遍的悲观情绪，增发的基础货币并不能有效地增加货币供给。这已被中国 2018 年的事实所证明。2018 年到现在，中央银行已经 4 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到年底贷款余额比上年末增长了 13.5%，比上年多增 2.6 万亿元，但货币供给量（M1）到 11 月底只增长了 0.005%。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发货币，在短期内还是可能不会有明显效果。但这些增发的货币会潜伏下来，在经济有回转，货币周转速度加快时跳出来，带来通货膨胀。而通胀所带来的货币贬值，就相当于向企业与居民征收通胀税。名义收入看似增长了，但生产成本和消费品价格同比增长，就会被完全抵消。由于从货币增发到通货膨胀之间有一个时滞，由于增发的货币是从政府一端经国有企业流向社会，政府及国企会吃掉绝大部分通货膨胀税，而民营企业相当于增加了税负。所以选择通货膨胀政策并不会使企业享受较低税负。

扩张性宏观政策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它本身只是一个反周期政策，而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周期性衰退，即由经济高涨带来的部分投资失误而导致的调整，而是一个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已经没有利润空间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反周期，而是遏制经济崩坍式下滑。如果我们不能对症下药，就不能阻止经济的继续下滑。并且如前所述，还可能带来滞胀，进一步恶化宏观经济形势，再想回过头来实施减税措施，已经贻误了时机，要想纠正过来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因为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市场因实质经济出现问题而出现危机，导致债权债务链断裂，货币供给迅速收缩，反过来又会伤及实质经济，房地产市场也会出现危机，导致整个经济的迅速收缩。最后，就是就业问题，中国过去每年要提供 1000 万新增就业岗位，如果经济严重下滑，就业问题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政策选择不是可以错的。

因而，能够真正扭转经济颓势的只有大规模减税。所谓大规模，我曾提出，就是增值税要减 3 个百分点以上，企业所得税要减 5 个百分点以上；总体来看，宏观税率应减 4 个百分点以上。这相当于 4 万亿元，只减几千亿元就不能叫“大规模减税”。大规模减税的核心作用，是通过给出强烈信号的方式，让企业和居民明确看到一个充分的利润空间，从而有动力进行投资，这是扩大长期有效产能的行

动。减税本身会通过改变分配比例而增加企业和居民的当下收入，从而增加当下的总需求，但减税带来的更大需求，实际上是上述这种企业的乐观预期所带来的投资需求，以及市场交易的恢复和增加带来的从市场中赚来的收入。这种收入是最健康，最主流，最大规模，最依赖于市场的收入，因为它表明企业的产品是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了市场的真实需求。它是对企业做了生产与投资正确决策的奖励。

如前所述，减税虽被称作“供给政策”，实际上带来的健康的总需求的增量。萨伊所说“供给本身就带来需求”，张五常更进一步说“人为需求而供给”，仰赖的就是一个有效而成熟的市场。只有当交易是自愿的，众多交易形成的价格信号不被扭曲，企业和居民根据价格信号进行生产和消费决策，供给才会直接变成收入，收入直接变成需求。所以，减税作为供给政策，就需要同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减税的另一个不言而喻的后果是，要精简政府机构。中国目前削弱市场制度，扭曲价格信号，干预市场主体行为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部门过大。如果我们再精简掉 90% 的行政许可，精简掉那些对市场有负面作用的政府部门，也精简掉过于臃肿的行政机构，就可以大大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企业产权的威胁和侵犯，从而同时解决对民营企业不友好的问题。

减税不会带来扩张性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挤占货币资源等问题，从而是一个副作用很小、健康且干净的政策。它还会因明显加速经济，使得税收不会像税率那样同比降低（即低于前述 4 万亿元）。它只有一个弱点，就是政府行政部门可能不喜欢它。因为减税就是减少政府行政部门可能控制资源的数量，这至少直观地不利于这些部门。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则要求增加政府行政部门要控制的资源，也就同时增加了它们的权力和利益。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更有可能成为宏观决策者的减税措施的替代品。但希望扩张性宏观政策发挥作用只是愿望。实际将要发生的事情很可能如本文所述，会很快导致情形的恶化。只有眼光超越了行政部门当下利益，有胸怀和远见的决策者，才有可能采取大刀阔斧的减税。中共政治局在去年年底已提出要“更大规模地减税降费”，我们将会看到，“大规模”是什么意思。 ■

注一：在本文中的“克强指数”的三个分量是，到 2018 年 11 月，货物周转量增长率（3.4%，权重 25%），货币供给量（M1）增长率（0.005%，权重 35%），发电量增长率（6.9%，权重 40%）。

注二：这是根据我的权威朋友提供的数据进行的修正，修正后的发电量增长率为 - 4.7%。

[【返回目录】](#)

郑也夫：教育是镶嵌在社会结构当中的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采访：杨红焰。本文首发于 2019 年 1 月 20 日观察者网]



本文作者**郑也夫**教授

前段时间文章《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刷屏，最近“减负三十条”的发布亦引起热议，教育的各方面问题一直广受关注，城乡教育资源的分布为何终究无法一碗水端平？“减负”政策呼吁多年，为何孩子的学业负担却越来越重？……观察者网就此采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

屏幕背后是社会结构

观察者网：前不久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广受关注，文中讲述了 7.2 万名偏远乡村中学的学生集体通过网络直播学习城市重点中学的课程，最终不少考取本科，甚至有 88 人上了清北的故事。但也有媒体、学者质疑，称屏幕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您如何看待这些直播课程的作用呢？

郑也夫：利用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网络共享，让乡村学生也可以接受一些城市学生才有的师资资源，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能否说“改变命运”呢？我比较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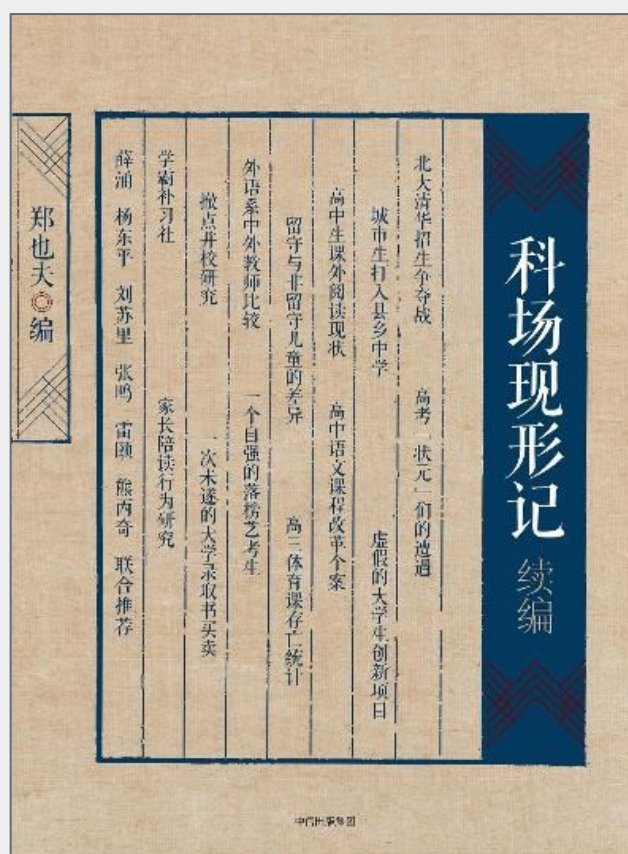
其实，“改变命运”这个提法本身就反映出我们社会结构上的问题。比如中国古老的科举制确实起到改变命运的作用，但我认为那恰恰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的梦想。而当代社会已经出现了更复杂多元的变化。

今天的德国可以称为枣核型社会，中等收入的人在社会中占大多数，上端和下端人都比较少。上端是指少量巨富，下端的人多数是移民，德国的公民基本上都在中段。对于大多数处于中段的公民而言，无论是哲学或者物理学的博士，还是技术学校毕业的技工或厨师，收入都差不多。而且在社会上受尊重的程度也不以职业或者学历来划分。区别更多在于专业水平和技术能力如何。

在德国这样的枣核型社会里，多数人受教育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命运。因为只要是德国公民，日后肯定会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会受人尊重，也不需要通过教育来得到城市户籍。

我觉得这样的社会已经超越了用教育改变命运的历史阶段，甚至实现了青年马克思的一些梦想。已经改变了异化的状态，不再被动地、无聊地从事异化劳动。人们选择职业都是听凭自己的兴趣，选择接受怎样的教育，也是兴趣驱使，而不是为了改变命运。如果需要用教育改变命运，那说明社会结构还是相对落后的。

观察者网：您的新书《科场现形记续编》里，有一篇关于“教育移民”的文章。您认为“教育移民”的方式能有效缓解城乡教育资源差异吗？



《科场现形记续编》封面

郑也夫：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不均是关涉历史的不平等。还要一碗水端平后才能减少“教育移民”。无论从乡到城移民，还是不同省份之间移民，都是为了高考占便宜。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的问题，应该是靠地方媒体来捍卫地方人的权利。弱势地方的权利要靠维权来解决，要从高层做一些调控来保证公正，

这样才可以解决“教育移民”的问题。

地方媒体应该捍卫地方权利，打破高校的地方本位主义。一流大学应该给全中国各省的孩子开放，通过管理和调控，最后对各地方的考生一视同仁，这样就会减少移民。

除了“教育移民”，频繁的复读也是很荒诞的，都需要靠政策来克服。复读这件事情有很大杀伤力，因为不仅考不上大学的人复读，各个分数段都有复读生。有的学生考不上大学，要读两三年能考上三本，有的学生可以，但是第一年没考上北大，要再来一年，复读机构非常愿意支持这样的学生，不收他的费用。如果复读机构培养出两个北大的学生，就可以借此做广告，扩大招生。

潜力相同的学生，应届生是不如复读生有优势的，复读生会挤掉很多录取名额，让竞争更激烈。根据我的计算，清华大学差不多百分之八九的学生是复读的。他们肯定挤占了一部分本来一年就可以考上的应届生的名额。而三本学生中概率更大。况且很多人甚至复读到三年。

所以我觉得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高考不要一年一次。复读的话，也可以减少时间成本。比如可以设置一个考试，一次在夏季考，一次在秋季考，如果复读的话在一两个季度就可以解决。还有一个建议是，复读生第二年分数要打折扣，抑制学生去再考一年，减少复读。

“素质教育”是个伪命题

观察者网：有观点提出，要推动社会结构进步需要高素质人才，这是“应试教育”做不到的，因此需要提倡“素质教育”。那您认为“素质教育”是否能成为解决我们现在教育问题的一个方案？

郑也夫：绝对不可能。首先，教育不能通过孤立地向前挺进，来改革和完善，教育是镶嵌在社会结构当中的。社会结构的不同形态将分别以不同方式影响教育。比如在枣核型社会，人们的学习就可能听凭兴趣，但在金字塔型社会，人们要通过教育改变命运，那就不在乎究竟学多少真知识，而在于如何把敲门砖做好，来敲开改变自己的命运之门！

教育现在不理想，学习方式是比较异化的，但这绝不可能通过管理者们提倡了十多年“素质教育”来改变。“素质教育”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极其荒诞的，其构词就是对祖国语言的侮辱。我在《吾国教育病理》第一章里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透彻。

参考《辞海》、《心理学辞典》等对“素质”这个词的解释，可以看出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先天心理和生理特征，较小成分来自后天教育。比如说一个孩子田径素质好，更大程度上是父母所赋予的，教育的成分小小注入到素质里，但主要是先天的作用。我们能说有一种教育叫做先天教育吗？

抛开词源学上的问题不谈，“素质教育”本身也实现不了。“素质教育”实际上是认为，教育工作者们对教育的认识有误区，搞了“应试教育”，如果他们改变观念，提倡“素质教育”，那么中国教育就能有很大改观。

这个说法是非常荒诞的。问题绝不在于中国教育工作者的观念，这样的话只要改变一下观念，问

题就可以轻易解决。关键是现在整个教育的生态是“军备竞赛”。老话说形势比人强，并不是想改变观念就可以改变的。现在这个形势下都必须参加“学历军备竞赛”的竞争，并非提倡改变观念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素质教育”这个提法不仅在构词上是荒诞的，在实践上也不可行。

观察者网：这些年随着提倡“素质教育”的呼声，很多课外辅导、兴趣机构应运而生，这也可以看作是您所说的“学历军备竞赛”的一部分吗？

郑也夫：中国的教育问题其实存在一个共谋，包括政府、学校和家长三方。这导致的结果是大家都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都要加入“学历军备竞赛”。大学扩招导致毕业生很难找工作，尤其像三本的毕业生，这实际上是又把竞争推迟到研究生阶段，那可能需要更多的金钱、时间、精力投入。

但政府觉得扩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大学管理者觉得学校规模得以扩大也很支持，家长们也很高兴，因为过去考不上的学生扩招后可以考上，但在竞争的时候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只是把结果推后，这是个障眼法。就这样政府、学校和家长三方一起营造了竞争的气氛。社会上很多辅助中考和高考的课外辅导机构由此而生。

兴趣培训机构是让孩子学习才艺的，如钢琴、绘画等兴趣班。现在家长不遗余力地让孩子学各种技艺，这方面家长的认识还是有误区。其实应该给孩子更多的时间，让他们自由支配。我认为不必这么功利地看待，时间应该怎么使用。不能让孩子老是为了一个任务或者目标，昨天把算术学好今天把识字学好，到周末还要把琴拉好。

应该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就像养花，水浇太多，肥上太多都不行，要让他慢慢成长，不必干预太多。但如果是金字塔型社会的话，公民不富裕，都会尽早加入竞争，来争取一个社会中比较好的位置。

教育是镶嵌在社会结构当中的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教育的问题没法通过孤立地改良教育来解决吗？

郑也夫：对，社会结构应该是最大的力量，但除此之外，在教育方面也不是没有要反省和改进的地方。大多数人要改变命运，这一点改变很难，但我认为还有些慢慢可以做的事情。不过这恰恰不在高中阶段，高中竞争已经到了冲刺阶段，这个时候不太好解决。

实际上“学历军备竞赛”，让很多不该参加这个竞赛的人陪跑，他们或者考不上，或者最后考三本。花了很多钱，少年时代过得很苦，到最后还不是一个胜利者。所以我觉得要消除他们的陪跑，应该把中国的职业学校办得更好。

职业学校的学生一方面在这里学到一个真正能安身立命的技能，另一方面在这里成长，愉快地度过少年时光。因为那个技能是自己选择的，自己很喜欢，本身学起来又不怎么困难。但不能一年就毕业，因为如果这样就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童工了，未成年人不可以去工作，就在学校里慢慢学，愉快地成长。

我看到过这样的学校，办校者非常明智。学校里有各种娱乐方式，比如说合唱团、话剧团、京剧团、田径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以及拳击班等。学生玩得非常开心，变得很阳光，没有抑郁症，善于跟人交往，最后大多数在社会上因为非常外向，谋职的时候也受欢迎，都找到合适的工作，能够安身立命。

我觉得这样的学校要是办得生机勃勃，而且培养真正的职业技能，久了以后会对很多不适合读大学没有这个潜力的孩子更有吸引力。有些事情要围魏救赵，从职业教育做起，能够减少去参加高考去陪跑的人。

观察者网：那为什么职业教育没有在国内取得比较好的发展呢？

郑也夫：还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如果社会结构对的话，技工在社会上也能有不错的收入，而职业声誉跟收入挂钩，要是收入很低，再怎么样营造这个职业，其声誉也不会高。如果很多职业在社会上的收入和声誉都不低的话，慢慢的职业教育就好办一些。现在职校生全都是落榜的人，全都不是自愿选择的，这当然是一个难点。

此外，职业学校也需要能确实传授扎实的技能。德国职业教育是产业部和教育部联办，只由教育部是办不好的。因为教育部此前办教育，无论小学初中高中，都是教授书本知识，不教职业技能，没有这样的师资。

德国的职业教育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实习，少数是在校园的教室里。这样学的本领非常扎实，可以说是就业直通车。除此之外，孩子在这里要玩得很高兴。技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要在这度过一个愉快的少年时光。

观察者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民营教育机构出现，这些自主性更强的机构是否会有助于改善现在的教育生态？

郑也夫：应该会有，但这需要大家慢慢匡正，慢慢理解。民营教育机构短期内专注的也是所谓“应试教育”，因为大学青睐的是考分高的学生。有了自主性以后还要贯彻培养什么样的毕业生。

这是中学跟大学的一个调整过程。有了自主性，但关键是发力点在什么地方？而且这还是一个博弈，是从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的过程。如果大学看重的是一些真实的潜力，中学就会有这个导向去培养有潜力的毕业生，也帮助大学筛选出这样的潜力。如果大学越来越看重考分，那么中学的培养毫无疑问就是以考分为导向。

二者是互动的，但这个互动会来得很缓慢。关键在于互动的过程，而不在于教育机构是民营的还是公办的。

高校应该更“专”还是更“宽”？

观察者网：现在很多高校同时在提倡“通识教育”，倡导学生广泛涉猎各类知识、发掘兴趣，您认

为这样能否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郑也夫：其实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就都是帮助同学建立自己的兴趣。这不是靠施教者完成的，如果教育环境和方式比较好，每个人慢慢就都会形成自己的兴趣，会按自己兴趣的驱动去做愿意做的事情。

“通识教育”更有利于多数人找到自己的兴趣，如果过早就进入一个专业，有可能所做的事情和所学的专业与自己兴趣不相符。“通识教育”的话，一般接触的知识面更宽广，专业形成得晚一些，更有可能选到和兴趣相符的领域。



图片来源：复旦大学教学网

当然存在少数人，比较早就有一种强烈的导向，有自己的兴趣所在和明确的方向。但晚一点专业化，其实对多数人可能更合适。比如数学家杨乐在中学的时候就能确定自己的方向，但是他反对现在搞奥数，因为现在的孩子不是自愿的。

“专”还是“宽”，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伪问题。“宽”实际上容易让多数人找到合适的未来，找到自己合适的兴趣。过早地“专”造成很多误区，比如大学报志愿的时候知道专业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

我认为学校的制度设计，不能太早地让孩子确定专业，因为那时候还不明白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孩子进学校以后，应该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各个学科，然后发育自己的认识系统，调动自己的情绪，慢慢形成兴趣。

这是慢慢形塑的过程，一个学生可以最后在三四年级确定想成为物理学家，但他一二年级的时候，可能还学过诗歌，甚至美术和哲学，以后他的知识结构是很宽广。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要保证，最后选专业的时候，自己已经比较成熟，对各部门学科都已经涉猎过，真正减少选择盲目性。

观察者网：那您认为高校的方向应该是更“专”还是更具综合性？

郑也夫：一个民族当然应该有综合性大学。我们 1949 年以后做院系调整，学习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它不是一种智力追求，而是一种技术追求。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一种局面，技术类的学校占压倒优势，综合性大学很少，应该增加综合大学，所以进行合并。

这些改变有其道理，但这样的学校也应该有个限度，不能无限地多。还有一个必须尊重的基本事实，就是一个大学最好要有校园文化，不同院系的师生们在这里能够有交往。不能名义上叫综合大学，但只是把几个大学强行合并，没有共同的校园，那样校园文化活动是割裂的。这很荒诞，完全是行政导致的结果，不是大学的自然发育。

另一方面，大学扩招导致学校里涌进太多学生，这些人当中更多人实际适合做技术，不会热衷于宽广的知识，对他们的期待和潜力是不相匹配的。他们适合进职业学校学习做一个好技工，当然可以追求业余的兴趣，比如可以是诗歌的粉丝，但要有一个扎实的职业。

本科生更不要说研究生，其实不适合所有学生，适合潜力更高的一部分人。对这一部分人要提倡不过早专业化和职业化，应该热衷智力和思想的训练。现在高校释放的目标和同学们的需求对不上，大学应该和职业学校要分开，分个释放目标，让不同需求的学生分别进入不同的地方就好。

自主招生可以解决问题吗？

观察者网：那您觉得应该增加自主招生所占的比重吗？

郑也夫：如果自主招生比重大的话，搞得好的情况下，会比高考的一张试卷看得更清楚，但是前提条件是要有道德。美国高校录取一个学生，有 SAT 考试，还有本校考试，以及中学班主任推荐信，而且推荐信占比不小。

美国所有大学都是自主招生，学校普遍公德和信任度比较高，社会比较相信其录取的公正和规范力，所以高校敢于录取一些 SAT 分数不那么高，但真正有潜力的学生，而社会也不会有太多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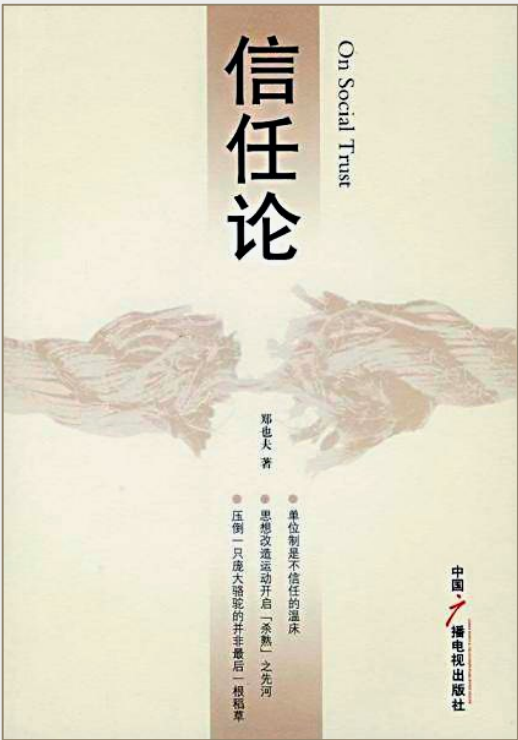
我们的学校没有这么强的社会信任度，如果这么做的话，就会招来骂声，会有承受不了的压力。而社会上的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有时候确实是拉关系的产物。道德问题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社会现实，自主招生的问题，得慢慢来。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我们还不是一个枣核型的社会，那在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的背景下，以综合素质作为大学入学门槛，会不会无形中给农村学生设置门槛？

郑也夫：如果考官有眼光的话，会对农村学生的眼下要求放低一些，因为他们小学和中学阶段受教育的环境和拥有的信息都比较匮乏，可能眼下这个时点显得赶不上城市孩子，但潜力大。虽然从分数上看，农村学生本校的自主招生笔试和全国统考的分数都比城市学生低一点，但城市学生高是因为教育资源好，农村学生潜力可能更大。

我原来有一个学生，没念过高中，初中毕业读中师，然后保送到河师大。他在读中师的时候不学外

语，因为缺了三年，到大学后即使努力学，外语水平也赶不上别人，后来留学美国，托福成绩很差，但还是被录取了。



《信任论》封面

因为美国校方看到他的履历，认为他没有高中阶段，三年没学外语，比城市学生外语分数差一些，但不证明他没有潜力，最后他获得麦克阿瑟全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

如果考官和高校，有很强的社会信任度，敢这样招生的话，虽然现在城乡教育资源不等，但考官可以加权。考官能够根据履历综合评定，关键时刻，考官的加权就能弥补乡村学生的不足。

北大教育学院有个教授，为了搞教育，在北大任教几年后，去北大附中做校长。目的是研究教育，一边做行政领导一边密切地观察，他说“什么试卷也赶不上一个优秀教师的两只眼睛，如果带一个学生两年，那任何试卷都不如我明白他的水平”。

但在信任度比较低的社会，能让教师自己说了算吗？这没法作为指标，国外推荐信的关键就在于此。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结果，如果行为和决策经常私心很大，会导致社会没有信任度，而后，一些良好的方法就不能采用，就走向恶性循环了。所以录取只能靠高考一张试卷，可以完成公正，但是没有效度。没有效度就看不出学生的真正潜力。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案能够提升我们社会的信任度呢？

郑也夫：宏观微观都有一些努力可做。微观的话，比如可以考虑研究生录取的推荐信。在美国是很看重大学老师推荐信的，我们这里研究生录取的时候推荐信是基本项，但是没有一个学校会看推荐信。因为推荐信写得都很好，全都是虚假的。

但偶尔也可信，比如推荐人是本院系非常熟悉的教师，知道他推荐的时候，是出于公心，对这学生

有深入了解，才把学生推荐上来，学生后来的学习果然也表现得很有潜力很优秀。对于值得信赖的推荐老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名单的储备。不了解的老师的推荐信，就不能够得到很高的重视；如果是名单内老师的推荐信，可以适当地增加权重。

宏观方面的话，在市场经济社会当中，中学小学的自主性都比较强，社会就会慢慢恢复一些信任。但一切都被垄断以后，自主行为很少，没有社会自觉，就发育不了道德。道德是在市场中慢慢发育的，要是不讲道德的话，声誉会很低，久了以后就找不到合作伙伴，所以必须端正行为。

计划经济时代，大家没有自主行为空间，没有道德实践，忽然有道德实践的时候，可能就会钻空子，不会考虑到声誉的重要性。要是有一个长期的市场社会，学校一直都有很大的自主性，久了以后道德就会慢慢恢复。 罳

[【返回目录】](#)

许章润：我家书桌在天地间

[许章润 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首发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微信公众号：三会学坊]

少年读书，没有书桌，也无所谓书桌。课桌是书桌，饭桌也是书桌。木床苇席为凭，翘起二郎腿，仰读，天便是书桌。石板草地撑持，双手托腮，俯读，地便是书桌。那铅字行行，如帆影片片，引领来一个个世界。四角都已翻卷、少字缺页的纸册，反倒勾起遐想联翩，心比天大，天地藏在心中。

青年读书，有书桌，也很在意书桌。立坐桌前，屏神敛息，倾听今人心声，猜详古人烦恼，将一己之忧思遣送于自家之幽思，神游冥想中，贫寒云乎哉。以桌为城，拥书作兵，咫尺便是天涯，我读故我在，时间始自当下。也曾红袖添香，风雨更阑夜，书桌护我，不叫觅封侯。也曾壮怀激烈，阑干拍遍，原是书桌造孽，纸上人生。

中年读书，方知书本是书，书本也不是书；始觉世道是书，人心更是书；才懂书桌盛书，书馆也盛书，满天满地都盛书。膝上翻读，相对两悦，管他头顶云卷云舒；卧榻斜倚，醉眼沉眠，知我者，杜康与书也，且由人来人往。留花不住任花飞，有书就好，心事如云随流水；天涯路远无由寄，且置桌上，留待月明探遗编。论得失，忧患大，问枯荣，是非多，但看夕阳接朝阳，做个教书匠，读书销平生。

老年读书，又将会是何种光景，哪里知道。夫子说得好，未知生，焉知死。这个星球上，死生来去匆匆，恒旧又恒新，每个人得享一次，只能徐徐知之。如此，与其急急探明，不如留待岁月慢慢教会。书香灯影里，一卷在手，安享定在的宿命，消受渐悟道启明，岂非天造地设，还不赶快谢天谢地。

这天，是书；这地，是书。

这天，是书桌；这地，是书桌。

哈，啊，我家书桌在天地间。 🍷

2008 年 11 月 26 日于无斋

[【返回目录】](#)

龚刀韧：从一则旧闻看美国新闻出版自由的意义

[**龚刀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首发于 2016 年 4 月 7 日 FT 中文网，图片与说明为周刊编辑所加]



前不久，我在国内一家新闻网上看到一则旧闻，标题是《苦笑往事：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讲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旧事。因为没有注明信息来源，我刚读到这段旧闻时还不大相信，以为是虚构的讽刺笑话，但里面提到的人物都是真名实姓。经查找，这一旧闻来自《中国青年报》2011 年 12 月 7 日第 12 版刊登的一篇纪实报道《国门开》（冰点特稿第 820 期），的确是一则真实的故事。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原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建交后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新闻与文化参赞的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 中文名唐占晞）负责两国的文化交流工作。1979 年初在送走和迎来中美双方第一批留学人员后，汤姆森还要落实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选几十个中国人到美国访问，包括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士。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 5 家颇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汤姆森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在汤姆森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33 年后的 2011 年 11 月 15 日，汤姆森这位前外交官以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身份接受了中青报记者王波的采访，他回忆说：“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

不相信，一脸疑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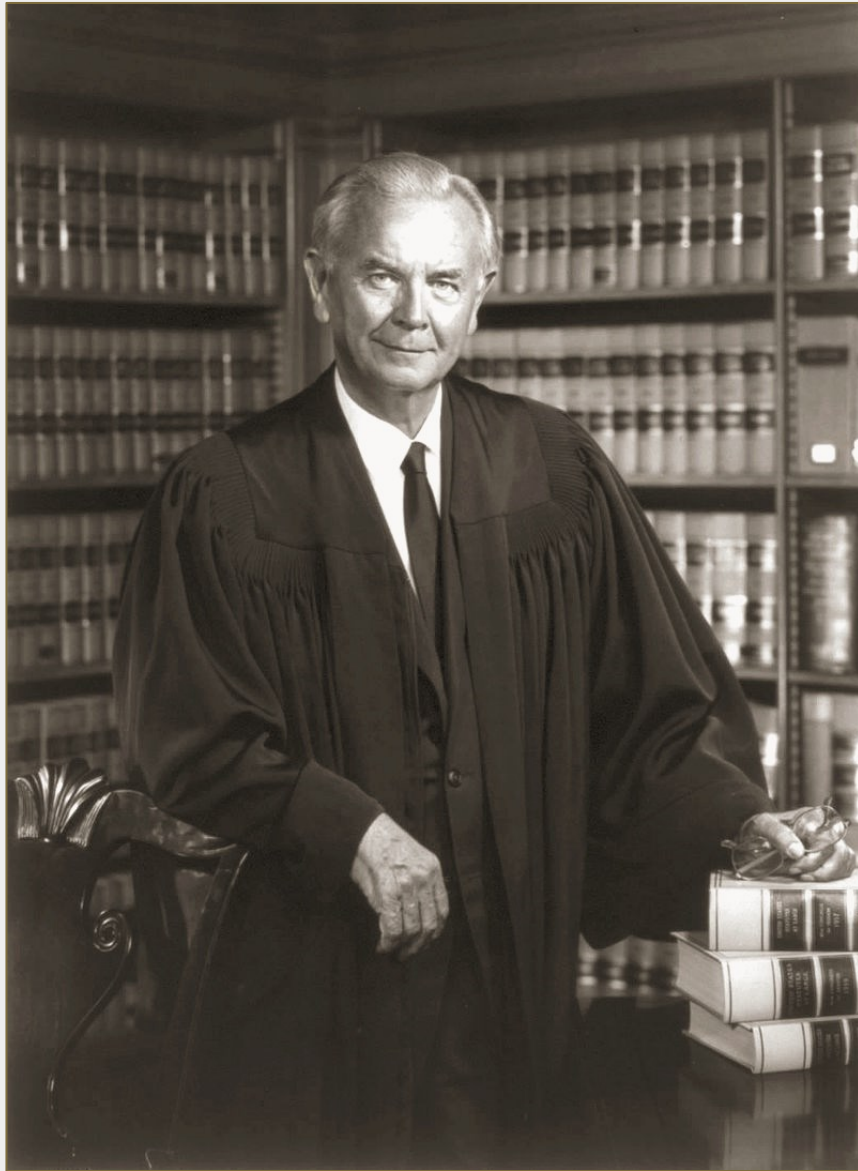
这段现在看似荒诞可笑的旧闻，却真实地反映出经历长期闭塞之后的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无知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其实，相似的旧闻还有不少，如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国政府派遣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由于出国前长期受到的政治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出国后的见闻立即使他们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结果相当多数的中国留学生学成（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滞留不归。

然而，这段旧闻让我想到的主要是，就北京 5 家有影响的媒体编辑访美之前的十多年间，《纽约时报》恰好经历过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两次诉讼都涉及到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问题。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也是宪法修正案的重要促成者，他在 1804 年的一封信件中指出：“人可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

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是 1964 年“《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1960 年 3 月 29 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声援马丁·路德·金和南方争取自由委员会的名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广告，广告描述了南部地区肆虐的种族歧视现象，不点名地批评了当地警方打压民权人士与示威学生的行为。由于审查者把关不严，广告部分细节失实。事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在当地法院起诉了《纽约时报》，初审最终判处《纽约时报》和四名牧师赔偿沙利文 50 万美元。1962 年 8 月 30 日，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驳回《纽约时报》的上诉，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保护诽谤言论”，维持原判。两审失利后，被各地政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几乎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复审此案。1963 年 1 月，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复审该案。

1964 年 3 月 9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见上图）大法官们以 9 票对 0 票，撤销了下级法院的裁判。这是在联邦法庭上首次将宪法第一修正案原则应用于州诽谤法。由布伦南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指出：在美国，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热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本案中的那则广告，抗议的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公共议题，它显然有权得到宪法保护。”这段话成为日后被频繁引用的经典判词。判决宣布了在美国，针对政府官员的诽谤言论，同样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美国不存在诽谤政府罪；强调批评政府和批评官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个判决也改造了普通法中诽谤诉讼程序。此后，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明知所言不实，存在重大过错，或者罔顾真相，明显不负责任。关于该案始末，曾担任过《纽约时报》编辑和记者的安东尼·刘易斯所写的《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值得一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中译本）。该判决显然受到美国哲学家米克尔·约翰的影响，他

在 1948 年出版的《言论自由与人民自治之关系》里提出，人民讨论公共事务的言论应当享有绝对的自由，不受限制，公共言论是人民自治的基础，政府不应干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设人权事务委员会，在 2011 年 7 月的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中也指出：“在涉及政治领域和公共机构公众人物的公开辩论情况下，《公约》尤其高度重视不受限制的言论。”对政府或其官员的批评，即政治批评的自由正是民主社会的基石。



小威廉·约瑟夫·布伦南 [William Joseph Brennan, Jr. 1906.4.25—1997.7.24]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956 年获艾森豪威尔提名任此职

第二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是 1971 年“《纽约时报》公司诉合众国案”（俗称“五角大楼文件案”）。1967 年，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了检讨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的教训，命人组织了一个“越战历史专题组”，收集了几十年来的各种资料，1969 年汇集成 7000 多页的研究报告并被列为绝密文件，这就是后来被称的“五角大楼文件”。1971 年 3 月中旬，《纽约时报》获得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为了揭露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对美国人民的欺骗行为，《纽约时报》决定自 1969

年6月13日起以连载形式公布“五角大楼文件”的主要内容。6月16日尼克松政府以触犯联邦反间谍法为由，将《纽约时报》告到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根据政府要求下达了禁止进一步发表文件的临时禁令。同日《纽约时报》在原来计划连载文件的地方换上了这条新闻：“应美国政府申请，法官下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在《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期间，也获得“五角大楼文件”的《华盛顿邮报》6月18日又接着连载文件。尼克松政府又把《华盛顿邮报》也告到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之后其他一些报纸如《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太阳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相继刊登“五角大楼文件”。6月25日，《纽约时报》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败诉后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这个案件中担任《纽约时报》辩护律师的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所著《第一修正案辩护记》也有了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1971年6月3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支持《纽约时报》。“五角大楼文件案”最常被引用的经典内容是由布莱克大法官执笔、道格拉斯大法官加入的法律意见。其中指出：“报刊是服务于被管理者的，而不是服务于管理者或统治者们的。政府审查报刊的权力已被废除，所以报刊将永远保持对政府进行谴责的自由。”“‘安全’这个词是广泛而含糊的概念，不应被用来废除体现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本法。以牺牲信息自由的代议制政府为代价保守军事和外交秘密，并不能为我们的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布莱克大法官(左)与道格拉斯大法官(右)

“五角大楼文件案”后，十分恼火的尼克松总统建立了一个调查泄密的专门机构，“管子工小组”，这个小组采取了一些不正当手段调查为上述报刊提供“五角大楼文件”的艾尔斯伯格。艾尔斯伯格是

原兰德公司雇员、曾参与过文件制作。这些不正当行为在后来的“水门事件”中曝光。在 1972 年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以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 5 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暴露后，尼克松总统有无直接责任问题成了焦点。尼克松的亲信用一切手段对付调查。《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穷追不舍，通过与代号为“深喉”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事件 33 年后公开身份）的秘密接头，找到一些重要线索，并通过调查式报道曝光出来，最终对促使尼克松总统辞职起到关键作用。《华盛顿邮报》这两位记者的成就开创了美国新闻报道的新时代，因为他们摧毁了新闻业的一项潜规则：对“敏感”信息保持沉默，比如肯尼迪总统的不检点行为和约翰逊总统的不道德交易。

在“水门事件”两年后的 1974 年 7 月 24 日“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以 8 比 0 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伦奎斯特大法官因曾在尼克松政府任职回避），裁决命令尼克松总统交出有关窃听的录音磁带，从而促使面临弹劾的尼克松被迫辞职。当时最高法院 9 名大法官中 4 名是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任命的，但在宪法原则问题上没有一位大法官对总统报恩。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为终身制——没有任期和法定退休年龄，因此最高法院的 9 位大法官中高龄者居多。这个案件经典地体现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独立和权威：没有一兵一卒、手无缚鸡之力的 9 位老人竟有权对美国总统——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总司令下达命令！记得 1995 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研究时，著名国际法和宪法学者路易斯·亨金教授就多次以这个例子来说明美国有尊重宪法和服从法院决定的“宪法文化”。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美国也不例外，总统及其政府滥用权力的例子屡见不鲜。不过，在遏制总统及其政府滥用权力上，美国新闻出版自由和司法独立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

[【返回目录】](#)

金雁：东欧的“犬儒化”阶段

[金雁 东欧问题专家，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首发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微信公众号：秦川雁塔]



二战后东欧被按照“莫洛托夫计划”进行苏式改造，使它们变成了“地理上移动的苏联复制品”。不管原来的基础条件如何，统统强制搞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工业中私人企业，取缔市场，统一调拨物资和实行计划分配。

到 1948 年年底，捷克 20 人以上的公司几乎绝迹，匈牙利工业的 83%、波兰工业的 84%、罗马尼亚工业的 85%、保加利亚工业的 98% 都归国家所有，1949 年又咄咄逼人地摧毁私人小业主和单干农民。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会被送去劳改，在捷克的 1300 万人口中有 10 万以这样的罪名遭到拘捕，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行政清理”人员，在总人口 900 万的匈牙利有 1/10 的人经历过被捕、监禁和流放，东欧人的压抑情绪可想而知。

1953 年 STL 去世，东欧各国立即涌现出改革浪潮，同年 6 月 17 日，东柏林 40 万工人发动工潮，保加利亚工人也闻风而动。苏联害怕引起传染效应下的连锁反应，赶紧通过操纵各国党内的“保守派”替换“改革派”，强压下拟议中的改革方案。

1956 年苏共 20 大《秘密报告》出笼，东欧各党再次出现改革呼声。1956 年和 1968 年，波、匈、捷都以不同的抗争形式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苏军大兵压境以坦克粉碎了东欧人民探索的希望。

克宫明确指出，阵营国家只有有限的主权，一切民族主义和“特殊形式的道路”都是不允许的，任何想要跳出莫斯科掌心的做法都会引起军事干涉。



1956 年，匈牙利街头被毁的苏联坦克

捷共领导人姆莱纳尔后来回忆说，1968 年当每个捷克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手持武器的苏联红军时，我们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观念一下子都退到了底”。这时东欧民众反苏式体制的共识达到高潮。



赫鲁晓夫楼

因为苏联人扶植的“莫斯科傀儡”的“合法性”严重失缺，靠坦克的军事占领和严厉的镇压手段只能暂时控制局面，那些以苏联人马首是瞻的“莫斯科派”靠政治垄断无法“咸鱼翻身”获得原谅，于是

他们不得不调整策略，在严控不放松的情况下，允许民间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化”。他们企图以经济怀柔的方法来平复民众的敌对情绪，修复苏军占领造成的民族创伤。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方面东欧各国大举借外债在经济上“讨好”民众，另外改变了过去“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做法，扩大消费品的生产，虽然仍是短缺经济，但是供应的商品逐渐丰富起来，赫鲁晓夫式的“火柴盒”尽管简陋难看，却也大大缓解了人们的居住压力。在保加利亚职工工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得到国家转让的住宅产权。

到 1970 年代东欧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汽车、电视这些当时的高档消费品有了稳定增长，物质与刺刀并用的软硬两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奏效的。各国靠借债收买人心，谁都不去考虑“击鼓传花”的最后接棒者，“烂摊子留给下一任”。

波兰在盖莱克阶段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 3000%。为了与教会争夺农民，在 1970 年代初波兰就给个体农民提供了社会和医疗保险；捷克在所谓的“正常化”时期的硬通货债务增加了 12 倍；匈牙利更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而著名。到 1980 年代东欧各国平均的债务都翻了 10 倍，波兰、匈牙利则翻了 20 倍。

到剧变时匈牙利外债总额积累已达 226 亿美元，人均 2300 美元，匈牙利剧变后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这样直白地表述贷款的分配方式：“我们将贷款的 2/3 用来偿还利息，剩下的 1/3 用于进口消费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西方的私人银行都乐于向东欧国家贷款，这种借债“过日子”的方式，后来直接影响到剧变后的经济转轨模式。



1986 年罗马尼亚街头排队领取食用油的人民

从“螺丝钉”到消费者

一时间东欧处在“土豆烧牛肉”的“消费至上”的社会氛围内。有人据此评论说，东欧 Communist Party 发生了转型，其追求目标有一个本质的改变，与过去的激进的乌托邦理想相比，体制发生了某些“去意识形态化”的改变，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怪胎。它从倡导清贫的政党变成了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集团。

上层丢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追求，抛弃了清教徒式的口号，由于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剥落，统治者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和物质的兴趣。他们对理想、初衷许诺甚至文化传统都不感兴趣，只对政权本身表现出贪婪。体制的“逆向淘汰”机制，通过从统治集团中淘汰掉富有独立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者，把没有创造力的顺从者和执行者留下来的方法，开始了“洋葱从心里烂”的过程。

正如持不同证件者阿玛利里克所说的，“这种当局的唯一目的，应当是自我保全”，它们既不想“复辟 STL 主义”，也不愿头顶“残害知识界”的恶名，“它只想让一切照旧：权威得到承认、知识界保持沉默、制度不要为危险的和标新立异的改革所动摇”。这时的政权表现得不那么刚性，不那么原则，在实用主义和趋利性的驱使下斗折蛇行，为“保权而发展”使它变得可左可右。



上世纪 70 年代波兰产小汽车

统治集团在经济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为人民服务”的提法让位于赤裸裸的为私利的巧取豪夺。把政治掩盖在经济背后，成为一种流行的统治手段，官员们都变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派。他们不再提艰苦朴素、不再提勤俭建国、不再自我标榜是清正廉洁的典范，不再高调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而是公然提倡享乐主义，拼命地鼓励人们享受“醉生梦死”的生活。

过去当局是把国民当成服从性的“螺丝钉”来看待，现在则希望国民成为不关心政治的消费者。这样容易用物质来消解政治诉求，从强制人们服从命令转变到以物质诱导人们安心当“猪圈里的猪”。只要放弃政治追求，选择“为五斗米折腰”是会有安稳的“好日子”过的，从此不但让人们为私利斤斤计较而转移了注意力，更容易让人沉醉于偏安苟且的物质追求，所以执政者也时不时出台些需要“叩谢皇恩式的福利”政策。

捷克保守派代表比拉克说，过去我们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必须要在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货物，我们才能够用文献记载我们最终实现了目标。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总书记胡萨克说，“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情绪”。

接替纳吉的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说，“只要提供商品让老百姓高兴，哪怕社会主义模仿资本主义我也就满足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卡达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地下经济的“商品与服务黑市”，到1980年代初据估计匈牙利有9万地下私营从业人员。



卡达尔·亚诺什

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说，过去我认为社会主义就像纸搭的房子非常脆弱，现在看来，只要资本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提供资金，社会主义就会存活下去，只要“利用他人的资源为自己的枯竭的电池充电”。苏联有个政治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带着他妈去看他的别墅、汽车以及特供的奢侈品，他妈说，真

好啊！孩子，可是列恩尼德，要是 Communist Party 来了怎么办？

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后，由于国家以福利换自由，以及大力压缩社会功能，使得每个独立的个体离开了单位就像印度的“贱民”一样无处安身立命，单位不仅是一种工作场所，更多地成为一种依赖和寄托，加之消费风气的蔓延，玩世不恭的思想成为主流，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大行其道。

物质消解的这一手果然比一味镇压更加有效，很多人纷纷写“悔过书”认罪并“反戈一击”，重新站队成为热心整肃者，有些甚至比原来的保守派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在不久之前都还是纳吉和杜布切克改革的积极拥护者。捷克改革派领导人姆莱纳尔说，“只有在经历了 1968 年布拉格之春之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政治事件后的物质“收买”造成了“沉默的 70 年代”。

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麻木地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东欧的“面包时代”——“犬儒化阶段”。它被哈维尔等人称作是“没有头脑的时代”或“自我毁灭”的时代。米兰·昆德拉说，在这种世界里，“人们对前景一无所知，一切行为变得机械化，职员们并不关心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意义何在，只和一堆匿名的文件发生关系，更糟糕的是，他们是文件中一个个错误的影子。”

国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回报人们在政治上保持沉默，福利是需要自由作交换的。东欧的“泛政治化”一下子变成了“政治冷漠化”，似乎那里的人们忘记了风起云涌的 1956 年和 1968 年，沉浸于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时间进入了一个“历史休止期”。

“脑袋撞不破墙壁”

但仍有一些人在苦苦思索，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必须要回答为什么会有犬儒化的局面。他们认为造成“面包时代”的首要原因是：高压统治带来的恐惧。

匈牙利事件后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几千人为此丧生，另有 341 人被判刑和处死，总计有 2.2 万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1.3 万人被关进拘留营，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处在严密的监视下，估计有占总人口 2% 以上的人逃离了匈牙利。布拉格之春后的大清洗，1970 年全党更换党证，50 万人被开除出党，主席团和书记处 50% 以上的人被开除，70% 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1/7（200 万）的人受到株连，20 万人流亡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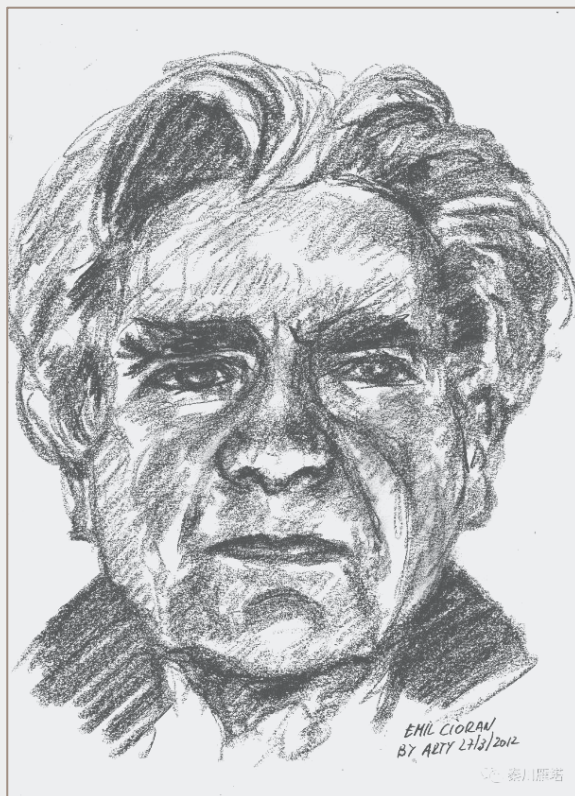
在和平时期除了大量的苏联驻军以外，东欧国家都靠庞大的强力部门和军警宪特来维持运转。让“远离火线的军人在后方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最好办法是把专-矛头指向本国民众，以震慑的方式让整个社会在“恐怖制度”面前低头。恐惧社会的压制性是造成两面派人数增多的直接原因，整肃之后人们态度的转变并不是这些人的想法改变了，而是他们害怕表达自己的真实信念，当然不排除其中的投机者。

在政治环境的苦难面前屈服的另一个因素是，历史上这些民族的挫折感是造成他们“集体生存的恐惧”的心理特征。上述国家在历史上多次经历过动荡，受尽了大国的欺辱，遭受侵略、被外国占领、

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报等挫折不断的历程。他们自称“小民族”，小民族的概念不是数量上的人多人少，而是指一种命运多舛的民族悲剧。

米兰·昆德拉说，小民族的概念“是指一种状况，一种命运，他们在历史上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的傲慢，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因此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受害于大国的“小国”，他们的历史就是在纳粹和苏联交替恐怖中延续下来。

近代被欧洲出卖的教训使他们认为“布鲁塞尔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只有美国才能帮助这片旧大陆”。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转轨国家的左中右都有很多“疑欧亲美派”的原因。



埃米尔·齐奥朗 头像素描

罗马尼亚的埃米尔·齐奥朗在《有关小文化的悲剧》一书中说，这些民族随时担心可能突然被从地图上抹去，谈论一个国家的死亡或者消失，在西欧人看来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话，因为要想消灭、征服或者同化，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政治灭亡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而对东欧国家而言则是明摆着的事实，他们都曾经面临从地图上暂时或永远消失的窘况，他们都有过“丧失历史圣地，民族完全或者部分归顺于一个外来强国”的经历。

他们感觉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超出了承受能力，“脑袋撞不破墙壁”的理论由此产生。 ■

[【返回目录】](#)

云豹沙龙 | 2019-2020 年度众筹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 年 3 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 年 3 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干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 年 4 月,「**铁路改制: 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 年 9 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 年 10 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 2015 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 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二. 众筹方案

2019-2020 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1. 众筹目标: 3 万元 (2019-2020 年度 4-5 场沙龙的总经费)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3. 众筹回报：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 (每期沙龙仅一位)：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 (全年仅一位)：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861581962310001（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wistom113@163.com，13717696284。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2019-2020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HJCD1vHbBqVKjEEIDbA0g> 提取码: 7pxt